

# 全球对话

## 8.3

#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17种语言刊出

## 访谈Nancy Fraser

Christine Schickert

Hauke Brunkhorst  
Christian Fuchs  
Andrea Silva-Tapia  
Hlengiwe Ndlovu  
Gerassimos Kouzelis  
Haryati Abdul Karim  
Esteban Torres Castaños  
Amy Austin Holmes  
Peter Wahl

## 被挑战的民主

## 纪念 Aníbal Quijano

Nicolás Lynch  
Raquel Sosa Elizaga

Joshua Budlender  
Vassilis Arapoglou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Fabian Kessl  
Mustafa Koç

## 面对贫穷

## 理论视角

Sujata Patel

Marta Bucholc  
Jan Czarzasty  
Juliusz Gardawski  
Adam Mrozowicki  
Vera Trappmann  
Katarzyna Dębska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Trepka  
Maciej Gdula

## 波兰社会学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8卷 / 第3期 / 2018.12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 主编的话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民主制度和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新兴和老牌民主国家都可以看到威权退化：由上而下的统治，民族主义抬头，公民社会的削弱。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尤遭受威胁。在本期《全球对话》中，当今最著名和发人深省的女权主义思想家之一 Nancy Fraser 讨论建立一个更包容的女性主义运动，并回应了民主衰退的说法，以及 99% 的女性主义思想。

“被挑战的民主”主题下的文章研究了世界各地的民主如何面临压力，从种族隔离后的南非局势，到在希腊的撙节政治，埃及革命中的女性角色的删除。作者描述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威权主义结盟的新发展，也评估了那些强化民主制度的概念和思想。

2018 年 5 月，秘鲁和拉丁美洲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 Aníbal Quijano 在 87 岁时去世。他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的“殖民权力”研究大大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好几个世代的社会学家。其两位同事和朋友回顾了他一生对社会学的贡献。

“面对贫穷”主题下的论文包括了希腊撙节政治的，拉丁美洲日益增加的贫穷妇女

人口。我们邀请了来自全球的六位作者，解释贫穷现象的区域发展以及政策制定所面临的阻碍。

印度的著名社会学家 Sujata Patel 在她关于全球现代性的文章中讨论了全球化理论的本质和内容。她对多重现代性的概念及其批判提出了历史的是与解读。

波兰思想家从一开始在把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问题提供了对波兰历史的深刻见解。但是，其历史不仅让我们聚焦了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其蓬勃的社会学传统在也触及了许多当代的核心问题。本期收录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了当前的波兰社会学，像是关于年轻临时劳动力，波兰人近期的投票行为，以及波兰公共领域的变化及其对当今社会学的影响。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的主編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http://isa-website.org)。

投稿請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mailto: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 编辑团队

主编：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编：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编：Aparna Sundar.

执行主编：Lola Busuttill, August Bagà.

顾问：Michael Burawoy.

编辑顾问：Gustavo Taniguti.

### 编辑顾问：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 区域编辑

阿拉伯：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Juan Ignacio Piovani, Alejandra Otamend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Md. Eunos Ali.

巴西：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Lucas Amaral Oliveira, Benno Warken, Angelo Martins Junior,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法国/西班牙：Lola Busuttill.

印度：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印度尼西亚：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Sina Bastan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Vahid Lenjanzade.

日本：Satomi Yamamoto, Sara Maehara, Masataka Eguchi, Riho Tanaka, Marie Yamamoto, Kaori Hachiya, Ayana Kaneyuki, Erika Kuga, Kaya Ozawa, Tsukasa Shibagaki, Michiaki Yuasa, Rikuho Baba.

哈萨克：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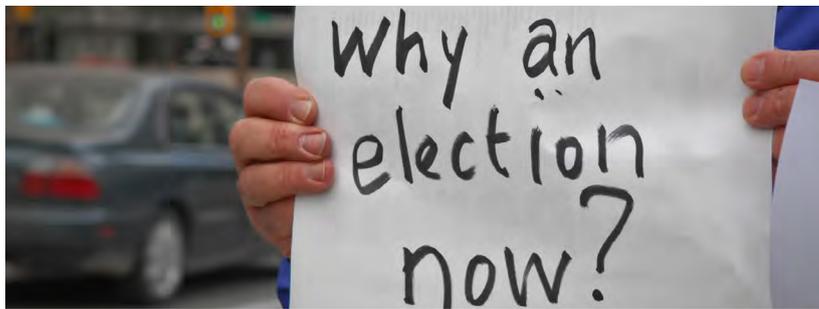
波兰：Jakub Barszczewski, Iwona Bojadżijewa,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Krzysztof Gubański,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Łucja Lange,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罗马尼亚：Cosima Rughiniş,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Luciana Anăstăsoaie, Adriana Lavinia Bulumac, Cristian Chira, Denisa Dan,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Aleksandra Irimie-Ana, Bianca Mihăilă,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ş-Mihai Muş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Alina Cristina Păun, Codruţ Pinzaru, Susana Maria Popa, Adriana Sohodoleanu, Elena Tudor.

俄国：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台湾：何經懋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当今世界许多地方的民主制度都遭受挑战。本期文章中有八位社会学家处理了这个问题，讨论人们如何为更民主的社会而抗争，并批判性地分析当前的民主政治。



贫穷问题和贫穷人口始终是社会学家迫切需要解释的问题。本期文章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五位社会学家讨论了贫穷政策的区域比较，并分析了食安等议题的不同历史脉络。



介绍波兰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对该国当前社会学研究的剖析。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赞助。

## > 本期内容

主编的话 2

### > 社会学访谈

新自由主义下的女性主义：

访谈 Nancy Fraser

Christine Schickert, 德国 5

### > 被挑战的民主

民主的危机

Hauke Brunkhorst, 德国 9

威权资本主义的兴起

Christian Fuchs, 英国 11

族群化的公民成为非法公民

Andrea Silva-Tapia, 德国 13

后1994南非的民主谬误

Hlengiwe Ndlovu, 南非 15

雅典的民主

Gerassimos Kouzelis, 希腊 17

社交媒体与民主：双面刃？

Haryati Abdul Karim, 马来西亚 19

阿根廷的民主倒退

Esteban Torres Castaños, 阿根廷 21

埃及革命中女性角色的删除

Amy Austin Holmes, 埃及 23

全球治理：民主秩序的概念？

Peter Wahl, 德国 25

### > 纪念 ANÍBAL QUIJANO, 1928-2018

杰出的知识分子

Nicolás Lynch, 秘魯 27

战士的喜乐

Raquel Sosa Elízaga, 墨西哥 29

### > 面对贫穷

后种族隔离贫穷的特征

Joshua Budlender, 美国 30

后纾困福利国家：希腊的平穷面貌

Vassilis Arapoglou, 希腊 32

为什么拉美的贫穷人口以女性居多？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哥斯达黎加 34

“慈善经济”：福利国家的阴影

Fabian Kessl, 德国 36

食安论述：21世纪的挑战

Mustafa Koç, 加拿大 38

### > 理论视角

全球现代性

Sujata Patel, 印度 40

### > 波兰社会学

我们(何时)重要吗？回顾波兰社会学

Marta Bucholc, 德国/波兰 43

波兰和德国的年轻临时劳动者

Jan Czarzasty, Juliusz Gardawski,  
Adam Mrozowicki, 波兰, Vera Trappmann,  
英国 45

为什么人民投给右派？

Katarzyna Dębska,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Trepka, 波兰 47

新公共领域社会学愿景

Maciej Gdula, 波兰 49

“在世界中，我们不能想象文化，种族，族群上同质的民族国家了。聆听那些无声的人民是为了深化民主而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

Andrea Silva-Tapia

# > 新自由主义时代 的女性主义

访谈 Nancy Fraser



| Nancy Fraser.

Nancy Fraser 是当今最杰出的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思想家。她是纽约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的哲学和政治学教授。她著作等身，其中包括再分配和认同政治与哲学交流 (2003)，与 Axel Honneth 的辩论，也提出了正义和不正义的理论，认为正义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概念化：分配正义和认同正义。她认为重分配和肯认对于正义来说相当重要。她出版了大量关于女性主义的书籍和文章，既是学者又是运动者，包括 *Fortunes of Feminism: 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 (2013)。本访谈是她接受了德国 University of Jena 社会学系后成长社会研究小组主任同时也是全球对话助理编辑的 Christine Schickert 的采访。

CS: 你的文章“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已经出版近十年了。在其中，你基本上认为主流或自由女性主义已被资本主义所收编。可以阐述一下吗？

NF: 我正在一个特别时机写这篇论文，这是在世界金融危机正在发生的时候，欧巴马谈论希望和改变，当选为总统。此时，每个人都承认我们处于一个非常

决定性的时刻，并且有希望。那个时刻的让我突然想起了历史和整个女性主义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对自由主义或主流女性主义所的方向感到不满，我之前曾说道过度关注认同和对分配的不足，但这篇文章我清楚说了危机是什么。

我感觉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与女性主义的发展同步。当第二波

>>

女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时，我们真的认为我们仍然在一个安全的，社会民主的或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运作。我们认为，该政权所带来的或多或少都是安全的，我们可以从那里走向一个更平等和民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女性主义将成为主角。

然而，恰巧发生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是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女性主义者和许多进步的，社会运动的人 在了解这一点时非慢。简而言之，在不了解政治经济如何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继续这种自以为重要的议程。我们看重分配，但没有意识到重要性，或者至少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为新自由主义赋予一种吸引力和合法性，允许它的解放能量，解放的吸引力作为一种合法化的媒介。

这是该辩论的点，因为我们处于危机时刻，显然，在2008年至2009年，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实机，正如我在文章的最后所说的那样，要跳出框框思考，通过转变来引入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可以成为真正的反新自由主义思想。

**CS:** 我可以想象许多被认定为女性主义者的女性认为她们为女性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受到了质疑，并对你做出防御性的回应。

**NF:** 当我发表文章时，我期待着我会受到批判。但实际上得到的远远少于我的预期，至少来自些学术女性主义者圈子而言是这样。即使人们并不完全同意我，他们也认为我信仰的某些事情把女性主义看错了。人们普遍认为，我们认为我们要创造的世界并不是我们实际生活的世界。很多人真的这么想。

我人为不需要指责，而是要了解某种形式的进步的新自由主权能够如何构建自己并赢得战斗。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的共谋者角色，以便进行修正。没有一位白人女性主义者喜欢听到黑人女性的声音，而且假设要就是与白人至上主义有关，要

就是对有色女性的不同情况都不敏感。但我们不得不倾听，我们必须吸收之。的确，我认为这也是如此，人第一时间反应通常是防御性的，但不能长久这样下去。

**CS:** 但我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并不认为自己会推进新自由主义议程，而是争取更多的性别平等……

**NF:** 这里的问题是：平等意味着什么？平等的概念本身很有争议性，有相互竞争的解釋。自由主义的解釋是精英解釋，女性是个体，她们应该像男性一样，争取机会将自己视为个体。这里的平等意味着消除歧视的，不平等问题是歧视问题，通过消除歧视性，个体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杰出。

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这是一个特定于阶级的理想。它的真正含义是，他们希望与自己阶级的白人男性相等。女性主义对我而言是一种更加强大和激进的平等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并不是使性别多样化，而是废除之。所以精英平等不被我称之为平等。自由精英作为对平等的解释带有正面影响，但仅限于一个非常小的女性群体。绝大多数女性都没有把破玻璃天花板，而被困在地下室，他们正在清理并扫除破碎的玻璃碎片。我试图发展另外版本的女性主义。

**CS:** 自从美国和欧洲选出右翼领导人之后，辩论围绕在社会运动中的“认同”的过多而忽略经济不平等导致右翼崛起。这场辩论对女性主义运动意味着什么，表面上看，我们作为女性的共同身份是一个动员因素？

**NF:** 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解决，在概念层面，我认为身份认同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分开的说法是错的。阶级的运动有两个方面，有结构面和认同面。我试图在分进行理论化，并认为阶级斗争都具有认同面，即使人们没有明确地关注这一点。我不认为女性主义有不是阶级运动。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与阶级剥削一样具有结构基础的。当人们说女性主义是一种认同运

动而非阶级运动时，我感到很怒。我认为我们女性的诉求有根深蒂固阶级的特征。所以，所有运动都有身份认同的面向。

但是，认同政治会让你误入歧途。现在有一个流行概念叫做交织性。我对这概念有一些批评，但重点是这是正确的。就是说并非所有女性都在同一条船上，并非所有工人阶层都在同一条船上，并非所有有色人种都在同一条船上。认同交叉的结构并不对称，权力也不对称。一位女性主义说过，“我们不会去看待这些，因为我们只是谈论女性”，所以最终只会代表特权阶层的女性发言。这就是自由主义，精英女性主义所做的事情。女性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种族和所有其他主要压迫轴线连结。

**CS:** 你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最近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内涵，并提出了“99%的女性主义”的想法。你能告诉我们更多吗？

**NF:** 这是我们从占领运动中借来的民粹主义用语。从严格的社会学角度来看，它并不严谨的，但其具有巨大的动员能量。这这不是Christine Lagarde或希拉里的女性主义。这是一种“战斗用语”，将自己描述为反对玻璃天花板的女性主义。这是一次修正尝试。几十年来，正如我在那篇文章中所说得，某种意义上而言，女性主义的主导潮流正在转变，像Hester Eisenstein所说的，是一个“危险的联络人”。代表1%的新自由主义力量的对立是代表99%的女性主义。这是个非常简单的修辞策略。它实际上卡住，并获得了一些牵引，对我来说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去感应就会发现是这样。

99%的女性主义真正关注的是绝大多数女性在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社会再生产和工作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下的女性。资本主义要求每个家庭的工资比以前的资本主义要多得多，攻击社会福利和各种社会保护制度，并将债务作为武器。女性在攻击中

处于第一线，所以99%女性主义者要团结，将它们与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问题理论化，像是我们以前在SDS(民主社会学生联盟)中，我们试图命名这个体系，而自由女性主义是关于社会体系的，讨论体系如何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好。

**CS:** 但是美国53%的白人女性在2016年投票支持川普，这位候选人不仅公开性别歧视，而且不关心性别平等。99%的女性主义思想可以触碰到这些女性吗？

**NF:** 不是所有人，但我认为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当然，有些人就像投票给川普的人一样仇恨希拉里的共和党人，不会投票给她，包括商界人士，那些想要利伯维尔场的人等等。其中很多人是共和党人，但不是全部。一些是来自去工业化地区的工人阶级女性，这些地区因美国制造业的外移而受害，其中一些是南方的女性。南部工业地带往往没有工会，近年来受到波及。还有农村女性，失业的小城镇女性，吸毒成隐的人等等。种点是这些人不会从女性主义政治或任何版本的进步新自由主义政治中受益。

关于他们投票行为的原因，我还没有看到太多严谨的民族志研究，但是我相信会有人写。我看过的几个采访报，虽然不是系统性的，但你可以了解人们的想法和感觉。当他们听到好莱坞录音(大选之前川普吹嘘很会抓女性“鸡掰”的录音)，他们说这的很糟糕，不喜欢，不尊重女性，不希望他那样说话，但考虑到其他一切，他仍然是投给川普。此外，我认为也有人不喜欢川普谈论墨西哥人或穆斯林的方式，但即如此，这些人认为川普是会为他们带来好生活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川普的支持者都是种族主义者。有川普选民真的是种族主义者，但是那些人我碰不到，我不担心，我担心那些人我认为占了很大一部分是可以通过左手碰到的。2016年有850万美国人投川普是在2012年投票支持欧巴马的。

重要的是，在11月大选时，另一个选

择是希拉里，代表进步的新自由主义。桑德斯代表了其他一些东西，但是初选输了。

CS: 那你怎么看待左边的 850 万美国人？

NF: 99% 的女性主义只是我的政治行动中的一部分，是为了试图找回像桑德斯那样的选项（我只是用他的名字作为方便符号）。要在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中它分为 99% 的人和 1% 的人，这当然这是粗糙的划分，但这个想法很清楚的：团结起来。你与桑德斯的像似是你可以将许多支持工人阶级，民生题结合起来，包括免费医疗保险，废除银行，以及大学免学费。

我所说的工人阶级时不只有白人，在美国的工人很多有色人种和女性，因此，对于有色人种来说，采取这些有利于 99% 的民生问题，并加上司法改革的议题，是紧迫的，而生育自由对女性来说是紧迫的，其他很多被归类成认同政治，但是不应该这样归类。所以我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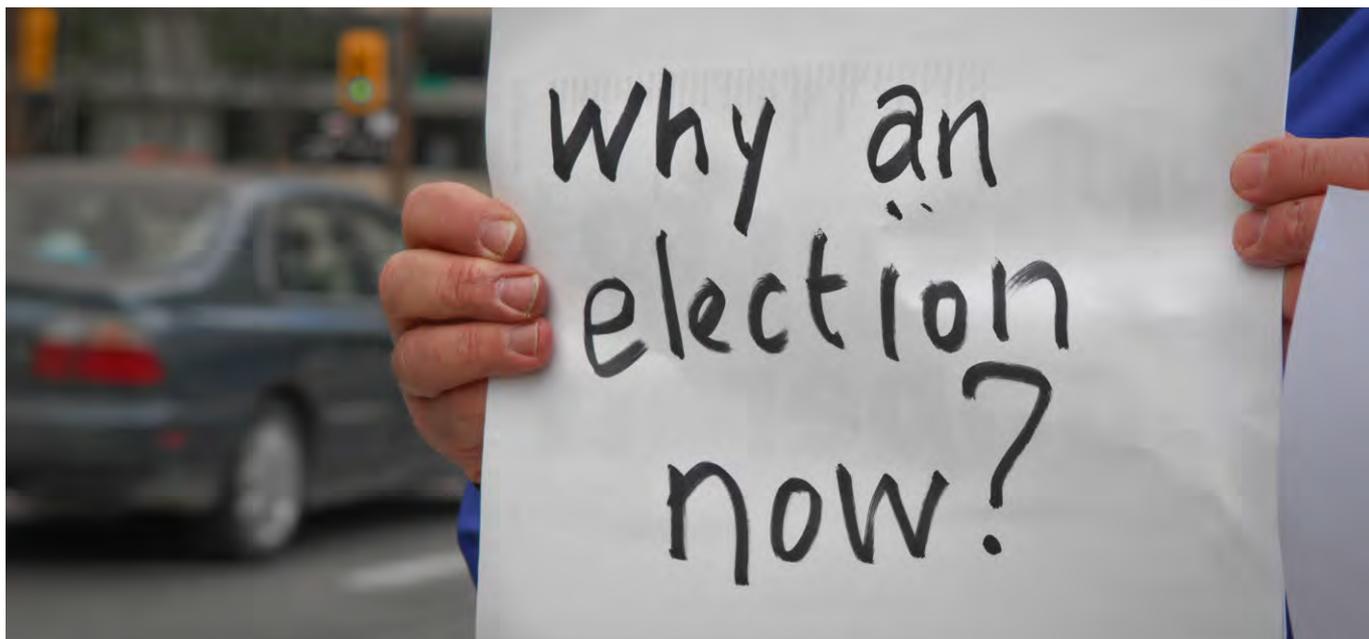
为 99% 的女性主义是其他社会运动的模范。例如我们也要有 99% 的环境保护主义。我们有各种运动，但是我们需要用一个共同的框架让它们结合在一起。



來信寄給 Nancy Fraser <[frasem@earthlink.net](mailto:frasem@earthlink.net)>

# > 民主危机

Hauke Brunkhorst, University of Flensburg, 德国



社会科学中对民主危机的分析很普片。Flickr/ItzaFineDay. 保留部份权利。

经过一个世纪的激烈，血腥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全球内战和世界革命，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国际都会国家（例如第 23 至 26 条，德国基本法），民主和社会国家（第 20 和 28 条，德国基本法）。在全球北方，正义是“存在概念”（黑格尔）。

生产关系部分已经被社会化，财产可被分成无数不同的形式，包括私有财和公共财。资本家和工人在同一个海滨度假胜地度假，资本家享受海景，工人享受街景。他们不能一起游泳，一起在同一个海滩上，孩子不能到同一所学校念书。工人驾驶货车，老板开轿车，可是两者都会碰塞车，因为还没有摩天大楼为富人盖直升机停机坪，也还没有穷人的摩天大楼。

然而，全球北方的繁荣奠基在南方的痛苦上。福利国家针对的是白人，男性，同性恋。

没有存在的矛盾就没有存在的正义（黑格尔）。民主在是色盲和性别盲的，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的社会运动兴起，人权取得进步，有色人种获得公民权利，妇女解放了，残疾人士获得权利，自决，环境保护意识抬头，国际城市都会化。学生和工人于 1968 年 5 月在巴黎联手造反时，现代资本主义 (Boltanski) 的艺术批评和社会批判合流梦想似乎终于实现了。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衰退。

## > 从国家镶嵌市场到市场镶嵌型国家

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智利（1973 年）和阿根廷（1976 年）发生了血腥军事政变，而英国（1979 年）和美国（1981 年）的新保守派选举胜利，官僚社会主义的自我毁灭（1989）最终消除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后障碍。在短

短几年中，国家嵌入式市场，成为市场嵌入型的国家体制。公共法的首要地位被大量（并且不断增长的）的私人法和跨国制度取代，如以前的罗马民法，这完全是为了符合追求帝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形式主义将我们所有人从非正式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得高度动态的非正式法律，揭示了正式成文法和非正式不成文法的新“双轨国家”（Fraenkel）的轮廓。

典型的例子就是欧盟。希腊在2015年危机高峰时期被排除在外。欧盟主席的律师解释说，欧盟没有程序规范，因为它在法律上基本上不存在，其成员除了谋杀之外几乎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制市场整合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其组织权力和警力保持不变，以有效执行“工厂维修队”的角色，确保“整体市场秩序”的维系，坚定地“镶嵌”力量（哈耶克）。嵌入市场可以确保投资者自由选择国家，但国家不能选择投资者，因此彼此竞争，以获得有吸引力的生产条件。结果，阶级，民族，国籍，世代之间的社会差异之大，可谓可怕。

足球比赛在很多方面都是全球社会的反映。如果英超联赛中的职业球员的收入只是1985年普通球迷的两倍，他们现在可以获得200倍的奖金。随着球员收入的增加，门票价格也随之上漲。足球迷有的无法跟上，有的辞职离开了，看台上剩下人都是赚了钱的人。体育场外有同样的情况：破败不堪的小区，学校，政治冷漠，酗酒，毒品，卖淫。这些地区投票率低于30%，而富裕地区的投票率则上升至90%以上，为后者的进步提供了前进的幻想。即使进度不多，但至少有钱赚。左翼政党在不断失去选民的情况下，在每次选举中都进一步向右移动，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市场经济无限地竞争下去。

### ► 社会不平等开启政治不平等

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摧毁了几十年的统治霸权，但正在失去其“公平价值”（Rawls）。失业人士，犹太人，女同性恋和以前被定罪的黑人女性再也不能离开“血缘连带”（马克思），那里有反犹太主义，反同性恋和厌恶女性的偏见，并且面临警察和男性的歧视和暴力。

如果竞选活动只提供技术替代方案，特点就是对世界市场进行微观经济战略的调整，而不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选择，于是民主已死。

购物中心的“闪闪发光的苦难”（康德）在利比亚沙漠，在海上，和在我们南部边境的难营中露出了可怕的但不闪闪发光的面孔。在希腊 Lesbos 岛上的 Moria 难

民营现在已经转变为驱逐出境中心，欧盟正在彻底转变。“自由，安全和正义的领域”（“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4条，以下简称 TFEU）“尊重基本权利”（TFEU 第67条），保障国际“庇护权”（文章第4条）18，“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和“遵守不驱逐的原则”（TFEU 第78条），其中“种族主义和仇外心态”被预防和打击（TFEU 第67条），被制定成具体的法律。不卫生，没有足够医疗资源，以及过度拥挤的 Moria 难民营可以看到，第一，砖墙边界包括拘留营，被拒绝住房的寻求庇护者，新来的遭准驱逐出境的非法移民。第二，边界由铁丝网，瞭望塔和武装警卫组成，围绕着难民营，中心是拘留所。第三，大海上的岛上没有人被允许离开，只单单凭借着我们对海洋市场的保护，边界成为自然法的一个要素。无论谁到达都被拘留，就好像旅行是犯罪一样。如 Carolin Wiedemann 所言：“像 Moria 这样的地方设计弥漫欧盟。该被称为“受监控中心”[德语：, Kontrollierte Zentren]”。我想没有人会想去猜这个缩写是什么意思。” ■

來信寄給 Hauke Brunkhorst  
<[brunkhorst@uni-flensburg.de](mailto:brunkhorst@uni-flensburg.de)>

# > 威权资本主义的兴起

Christian Fuchs,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英国

近年来，极右政治扩大并巩固了其权力。我们在美国有川普（共和党），在匈牙利有 Viktor Orbán (Fidesz)，奥地利有 Heinz Christian Strache（自由党），在荷兰有 Geert Wilders（自由党），在印度有 Narendra Modi (Bharatiya Janata 党)，在土耳其有 Recep Tayyip Erdoğan (AKP)，波兰有 Jarosław Kaczyński（法律和正义），法国的 Marine Le Pen（国民阵线），意大利有 Lega Nord，俄国有普丁（全俄人民阵线）等。如何理解这些现象？社会学如何解释？

一个角度是应该从民粹主义的概念来关照。Jan-Werner Müller (2017) 最近在他的“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中将民粹主义定义为“政治的一种特殊的道德想象，一种感知政治的方式，这种方式将道德纯洁和认同的人与那些被视为腐败背德精英联系起来。[...] 民粹主义是反民主的：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只有他们代表人民。“他还指出，民粹主义是一种排他性的身份认同，“构成”对民主的危险，“目的是”压迫公民社会。”

光谱的左边有 Syriza, Evo Morales, Podemos 或 Bernie Sanders（桑德斯），右边有川普, Geert Wilders 或 Marine Le Pen。像极权主义理论，激进的右派与左派相比较起来，右派的危险是很明显的。对 Müller 来说，川普和桑德斯都是民粹主义者。桑德斯当然是一位非典型政治人物，但与川普相反的是，桑德斯是民主派。

我在 2018 年的著作“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结合了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批判心理学。右派威权主义 (RWA) 包含了四个要素（见图 1）：自上而下领导的必要性；民族主义；区辨敌我；激进的父权（法律和秩序；战争和军队；征服的敌人；保守的性别关系）。RWA 的意识形态将注意力从阶级结构和资本主义转移到社会问题。难民，移民，穆斯林等被建构为代罪羔羊，要为失业，工资低，经济停滞，公共服务衰退，住房危机和犯罪等问题所负责。川普指责墨西

哥和中国导致去工业化和经济衰退，但没有提到美国资本如何外包工作的作法，包括中国血汗工厂和墨西哥边境加工厂，都是在剥削劳工阶级。

RWA 既不是一种想法，也不是结构，也不是社会形式。RWA 是一个可以在不同层次发生的过程：个人（威权人格结构，意识，个人政治行为），政治团体，意识形态，制度，社会整体。右派极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 RWA 的加强版，其积极追求身体暴力和恐怖作为政治手段。

文化主义者对 RWA 的兴起这样解释，说“后物质主义”社会的兴起造成了世代之间的鸿沟，老一代对过去的保守价值失去有所呻吟。但是，后物质主义假设无法解释为什么在 2017 年的奥地利联邦选举中，极右翼是 1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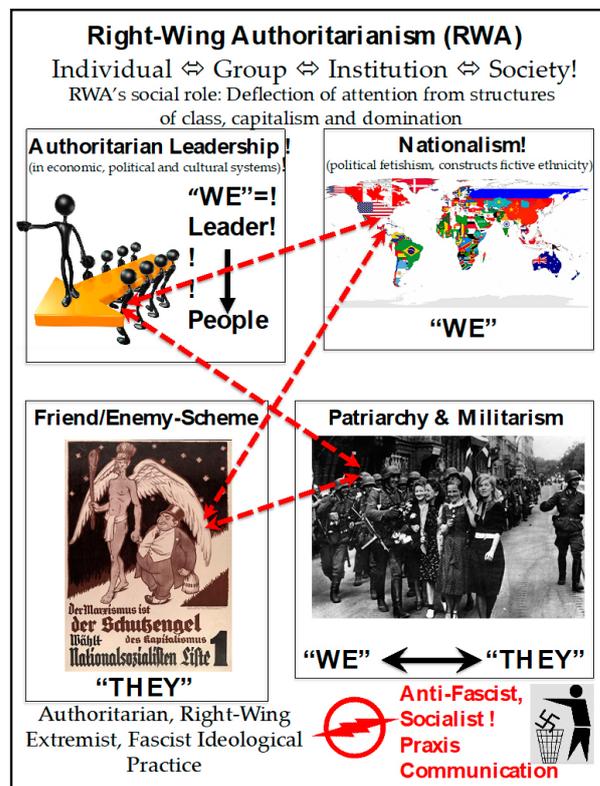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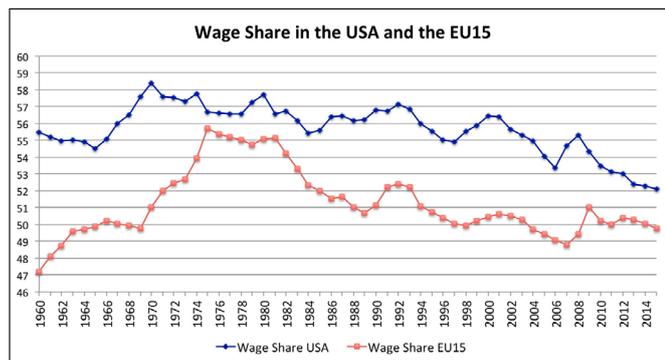


图1：右翼威权主义模型

岁年龄的人最受欢迎的 (30%)，但对于 60 岁以上的人是排名第三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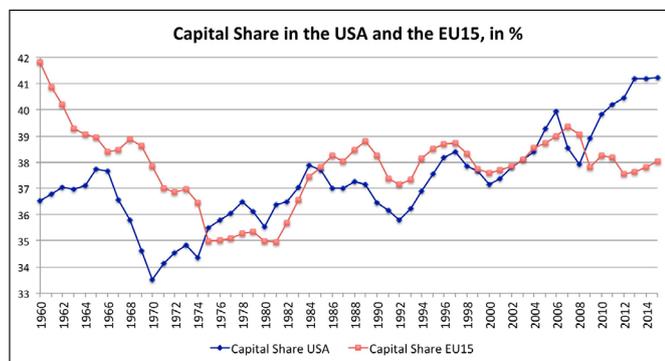
另一种解释是政治经济学取径。批判性政治理论家 Franz L. Neumann 在 1957 年的论文 “Anxiety and Politics” 中的取径很有用。根据这种解释，右翼威权主义的兴起与劳动的异化有关 (见图 2 和图 3)。其破坏性的竞争，社会异化，对社会衰退的恐惧，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和政党的异化。极右派的制度化焦虑度发了社会恐惧，寻找代罪羔羊。

图2：随着时间的过去，美国和欧盟的工资在GDP中的比例



资料来源: AMECO.

图3：随着时间的过去，美国和欧盟的资本占GDP中的比例



资料来源AMECO.

威权资本主义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本主义相互辩证的结果。市场自由与社会自由之间的矛盾导致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和不平等加剧，成为一新的政治型态。社会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化和新自由主义，左派的弱点，以及低估阶级政治和阶级分析重要性的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加剧了极右翼和专制资本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导致了异化。Harvey, Hart, Negri 等人，及我自己**在其他地方**所论证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带来了几乎所有事物的商品化，因此我们通过剥夺和资本下真正的社会包容经历了持续的原始积累。David Harvey 说：“异型导致了占领运动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种族主义运动。川普是不折不扣的异化总统。” ■

来信寄给 <[christian.fuchs@triple-c.at](mailto:christian.fuchs@triple-c.at)>

# > 族群化的公民身份作为非法公民

Andrea Silva-Tapia,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和Justus Liebig University Giessen, 德国

## > 殖民地的公民身份和民族国家建构

公民身份的概念很模糊，其意义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公民身份是指由国籍合法身份，有人则认为是一种社会身份。放在一起看，如 T.H. Marshall, Margaret Somers, T.K. Oommen, Engin F. Isin 和 Patricia K. Wood 等人的定义可以被描述为政治和地理空间中的成员类别。因此，公民身份的概念是民族国家的法律和象征类别。说起来简单，但是若考虑公民身份概念的历史脉络，那就复杂得多。

现代形式的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一起演变的。公民身份是一个同时与现代性，民族国家打造，认同归属感紧密相连的概念。我们能够追溯到十八世纪晚期的民族国家兴起，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以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这种观念遵循同样的民族国家建设模式。现代民族国家被定义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有成文宪法，并以平等公民的名义统治。因此，合法性原则从君主制（或君权神授）变为人民主权国家。然而，这些公民身份和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以建立民族国家（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

非法公民身份是另一种命名殖民公民身份的方式，这种公民身份被纳入我们现在的父权制，欧洲中心和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这种殖民世界体系通过全球种族或民族阶层来运行，这阶层决定了某些群体可以享有声望，其他群体则无。Anja Weiss 认为，“当一个长期稳定的类别决定了社会分类，实践，制度时，不论

是否属于该类别，这种标记都指向生物或其他种类的差异。”这种种族化或种族化的公民身份不仅体现在世界各地的土著和少数民族群体中，而且体现在遭受种族化/种族化进程的移民身上，如德国土耳其人，或美国的拉丁美洲人。这种种族化过程意味着一个群体由于其种族或文化特征而被歧视成一个同质群体。

在这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观念中，民族是现代国家建立的主体，也是其合法性的基础。民族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很明显，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经常互换使用“民族”，“国家”这两个概念。有时我们甚至将公民身份视为所有人的同义词。

## > 合法和非法的公民

将国家纳入同质文化群体的人被视为合法公民，而族群画得公民则被视为非法公民。虽然后者被视为公民，但不是合法或“真的”公民。这种与种族化公民身份是一种特殊的不平等，影响人们的尊严和机会平等，产生歧视和羞辱。这种不平等始于民族国家诞生时的公民身份不平等，遵循之前（民族国家或殖民时代之前）的分类结构。民族国家打造或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推动同质的民族认同，抛弃了特殊性，就像 Mapuches（智利的土著人）或印度的东北人（代表印度的不同种族群体）一样。今日人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去对待移民（如德国的土耳其移民）。智利的 Mapuches 和

“种族化的公民或是非法公民都被看成一个群体的一部分而以，从未有主体性。”

印度的东北人生活在工业发达的地区，就业和教育机会少。此两个群体都经历了与国家警察的纠纷冲突)，他们的身份面被压迫。就东北人而言，他们还面临来自其他人的暴力和骚扰，这特别发生在他们离开东北并迁移到德里，孟买等城市之后。

合法和非婚生公民是两种类型的公民，尽管两者都有法律上的承认。然而，前者被认可，而后者则被认为是次等的。非法公民“缺乏”某些要素，他们的文化和行为被认为是不完整的，这也引发了歧视和羞辱。

#### ➤ 民主带来的后果

公民身份指向个人，但此概念当被种族化或种族化时，主体性就会被剥夺。种族化的公民或是非法公民都被看成一个群体的一部分而以：“移民”，“阿拉伯人”，“穆斯林”，“原住民”，“东北印第安人”，从未有主体性。主体性是留给白人的。因此，欧洲白人的失败会被归因于个人错误，因为他们是公民，有特权。这就是“白人特权”。另一方面，被殖民者的失败，非法公民的错误，都被归因于他们的文化，民族，种族因素，不归因于个人因素。非法公民总是属于某个种族，不像白人是个人。白人特权是一种无形的至高无上特权，永远不会被连结到种族。种族对白人来说不存在，这个事实带来了自由。成功和失

败都被视为个人因素，和种族无关。

若我们不认真对待其要求，不承认某些群体的经历，那最终会可能产生冲突和暴力，所以我们不能幻想一个文化，种族或族裔都同质的民族国家了。要倾听那些没有发声权力的人，这是根植于历史的民主化任务。■

來信寄給 Andrea Silva-Tapia  
<[andrea.silva-tapia@sowi.uni-giessen.de](mailto:andrea.silva-tapia@sowi.uni-giessen.de)>

# > 南非1994年后的 民主悖论

Hlengiwe Ndlovu,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南非



受到了#FeesMustFall运动启发和来自于运动分子的数据而成。著作权: SWOP.

世纪的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之外，还有 46 年的种族隔离，这制度故意将黑人与社会、文化、空间、经济隔离开来。南非黑人要的是民主的具体内含。由抗争的代表人物之一图图主教创造的“彩虹国家”的想法表明，随着种族隔离的消失，南非将成为一个平等拥有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机会的国家。

#FeesMustFall 运动是围绕着认识到民主是一场闹剧，而彩虹国家是迷思的抗争。虽然大多数历史悠久的白人机构，像是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Wits) 和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UCT) 等，都以增加招收黑人学生数量而自豪，但这远非事实。这两所大学是该国最贵的大学之二，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认知暴力。此外，虽然黑人学生人数有所增加，但高等教育机构继续系统地将学生从社会，地理，文化和经济方面排除。

南非预计 1994 年之后那些被排除的群体将从民主制度中受惠。非洲民族会议 (ANC) 的口号是“让所有人友好生活。”人们期望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包括获得“自由宪章”提出的免费教育，不差的房子，水，电，就业机会，卫生，正如重建发展计划 (RDP) 政策文件中所描述的那些。1994 年之后黑人地区受到抗议浪潮影响，像是 2012 年 Marikana 大屠杀，劳工部门内的暴力事件，以及 #FeesMustFall 抗议等，都表明南非国家未能提供预期的民主化果实。

南非的大学离不开更广泛的社会秩序。若要是图解决 1994 年后的民主危机，重要的是重新审视南非民主的谈判转型，就像非洲其他透过谈判民主化的独立国家。谈判只是意味着各方的战略性重新定位，伪装成为实现“和平

**南**非近年自 1976 年 Soweto 学生抗争以来，受到前所未有的学生运动的影响。#FeesMustFall 运动于 2015 年出现，持续到 2016 年。这些需求围绕着免费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机转型和去殖民化。运动跨越了所有公立大学，其特点是学生和外包大学工人之间的联盟。这些斗争的核心是直接对抗民主的失败，以及 1994 年以后的“彩虹国”的失败。

虽然民主的概念有好几种，包括民选政府，自由，和公正公开的选举，以及行使个人权利，但对于许多南非人来说，民主的含义奠基在历史上对大多数本地人的排除。除了几个

转型”。这导致黑人人只获得行使其投票权和组织权的政治权力，这一权利继续受到1994年后的国家暴力影响。另一方面，土地，银行，矿产等经济实力和战略资源仍然掌握在以前的掌权者手中，这使白人至上主义制度的统治地位永久化。将近80%的黑人被排除在经济之外。因此，在没有面对结构性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下，谈论1994年后的南非民主是缘木求鱼。

#FeesMustFall运动面对黑人排除问题，并要求平等，免费教育，转型，去殖民化。有趣的是，历史上黑人大学，比如Fort Hare University（其中许多非洲斗士都受过此教育）等，自有历史记忆以来就一直处于这场斗争之中。然而，另一个问题是：南非白人至上主义媒体对历史上白人大学的浪漫化，将这场抗争提升到国际层次，被描绘为在Wits大学开始的运动。最重要的是，#FeesMustFall是在UCT的#RhodesMustFall运动已经提出了课程转型和去殖民化之后出现的。与去殖民化项目密不可分，而且这些斗争成为批判全球大学商业化和市场化项的一部分，牺牲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讨论。

虽然历史上白人机构声称已经改变了学生人口，但结构性系统排斥继续沿着种族界限分配不平等。过高的费用意味着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主要是白人优秀学生和一些中产阶级黑人）将有机会接触，可是大多数黑人学生被系统地排除在外，这让彩虹国家的观念幻灭。此外，国际和南非的学术人士仍然是白人为主，而学术课程仍然以欧洲为中心。这造成了文化冲突。大多数学术人员未能采用非洲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知识生产方法继续对来自贫穷乡镇的大多数黑人学生构成巨大挑战。

#FeesMustFall运动对抗民主制度的失败，倡议实现具体的民主和实现彩虹国家的梦想。尽管该运动对大学和国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它也面临着自己的挑战。在其最初的阶段，运动的特点是政治联系，种族和阶级议题的结合。然而一开始就有意识形态问题，性别问题，缺乏内部民主的问题。虽然这项运动是由womxn开始的，但是男同志有意接管了运动，并破坏了womxn所建立的基础。然而，#FeesMustFall中的womxn被认为不会复制他们正在反对的权制。于是运动分裂，因为许多人指责不同的分裂原因。此外，国家和大学镇压非常暴力。警察在校园内，过度使用武力。学生被瞄准，逮捕，排除在大学之外。但是鉴于非民主国家的镇压性质，该运动不得不撤退并探索推进斗争的其他方法。

#FeesMustFall运动目前处于不确定状态。

一些学生运动分子仍然在监狱和法庭中奋斗着。尽管南非正在推动穷人免费教育，但仍要继续争取自由和去殖民化教育。民主仍然是20世纪90年代在南非街头的的影响。最终释放了已故的抗争英雄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对于大多数南非人来说，民主仍然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彩虹国家则是迷思。对于#FeesMustFall运动者来说，抗争仍在继续，对于womxn和其他边缘的机构来说，民主在未来几个世纪仍然有得抗争。■

來信寄給 Hlengiwe Ndlovu <[hlengiep@gmail.com](mailto:hlengiep@gmail.com)>

# > 民主在雅典

Gerassimos Kouzelis, University of Athens, 希腊



希腊议会前抗议撙节政策。Flickr/konterz. 保留权利。

今天若要谈直接民主可能听起来很乌托邦，主要是它实际限制很大。像是最近的研究指出，在议会之外进行实质民主的想法是激进的乌托邦想象。在体制外或是非民主的国际组织中，“人民”如何行使权力？根据“谅解备忘录”指出的，希腊的条件不利于民主运作。议会和民代无法自主，其决定都是事先就被决定的。

国家主权被妥协掉，议会自主决定的权利于是形成一种产品（或许对有些人来说是合理的），这种危机被认为属于财政方面的：债务。这是让国家主权妥协的原因，只不过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缘故，让财政被放大。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毁灭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相当普遍，经济部门之间关系的政治和社会激进的重构，特别是资本主义整合和经济权力集团的结盟，让力量的相关性允许，培育，剥削了经济危机。

尽管“新自由主义统治”这个论述简单明了，但是也说明民主的倒退如何可能（“新自

由主义”），这种论述能够抓到，合法化，拓展此一论述。从希腊危机的角度来看，对民主的深度解构是新自由主义的真理。此论述的流行代表了自身条件及其后果，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动态，以及短期波动相关的一系列发展都和社会威权主义习习相关。

政治变迁以前我列出了2010 - 2015年期间几个核心焦点：

- 从根本上着手，增强经济实力，从社会出发，加速生产，其特征是渗透“精英”并将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挂勾。
- 媒体和文化实践的完全商业化（特别是以党派为由组织的垄断大众媒体和新闻媒体）。
- 代议士的衰落和商业营销式复苏（政党“超越”政治，是商业产品，以电视“明星”为效法）。
- 强加商品流通（“市场带领”）作为其主要原则。

>>

• “民主管理”的强加，并在不断扩大行政部门和部分司法部门的过程中实施，牺牲了立法机关（通过部长决定，未经议会批准和司法干预，具有政治性质和任意的。）

• 国家主权在国家社会形态和国际结构中的不稳定（通过“三马车条件”的日常保护。

• 建构一种小岛无法进行民主制度，议会功能不彰的论述，财政和货币政策领域特别如此，但也是布鲁塞尔决定的大部分（确实是“异常状态”）。

当2015年的政治变革时，这些面向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加强民主进程的目标，也就是激进左翼联盟设法扭转了最新政局发展。可是议会控制权没有得到，大多数决策仍由外部决定或与对（所谓的）“制度”的承诺。

新的政治条件限制了与纳粹团体公开合作的机会，安全措施的实施，以及监视和威权镇压的行动，这些限制使社会开启民主机制。日常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再次变得“正常”。

可是新自由主义论述仍有两个领域决定条件，第一个是将现实看成财政报表，作为会计项目，“人民”既不能了解也不能决定，因此基本上是反民主的。第二个领域是公共领域的解构，这样一来，公众舆论无法形成。尽管政治发生了变化，但被垄断的媒体的霸权论述仍然是垄断“现实建构”的主要因素，而实质辩论和争论却不常见。

因为无法改变这两个领域的力量，这让我认清了，民主进程的解构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没有关联，因为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必须被认为是“系统性的”，并且被当成当代民主危机的关键。

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带来的民主倒退证明了权利“必要”被限制的论述发挥了作用，情况不一样了。这不仅涉及社会权利，也因为难民危机和对恐怖主义情绪的操纵（选举和公民投票）导致了公民政治权利的妥协。前五年，政府开始彻底遏制社会权利（工作，社会福利，健康等），否认政治要求（控制和公众舆论），宣传民主是“奢侈品”的想法。新政府优先考虑经济，遗忘民主原则，用借口搪塞一切。

如果政治地景没有改变，危机继续存在，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实质上所有公民的生活组和观点以及思维方式都受到威胁。家庭和小区的未来也是如此。这很重要，因为缺乏观点是极权主义和反民主的温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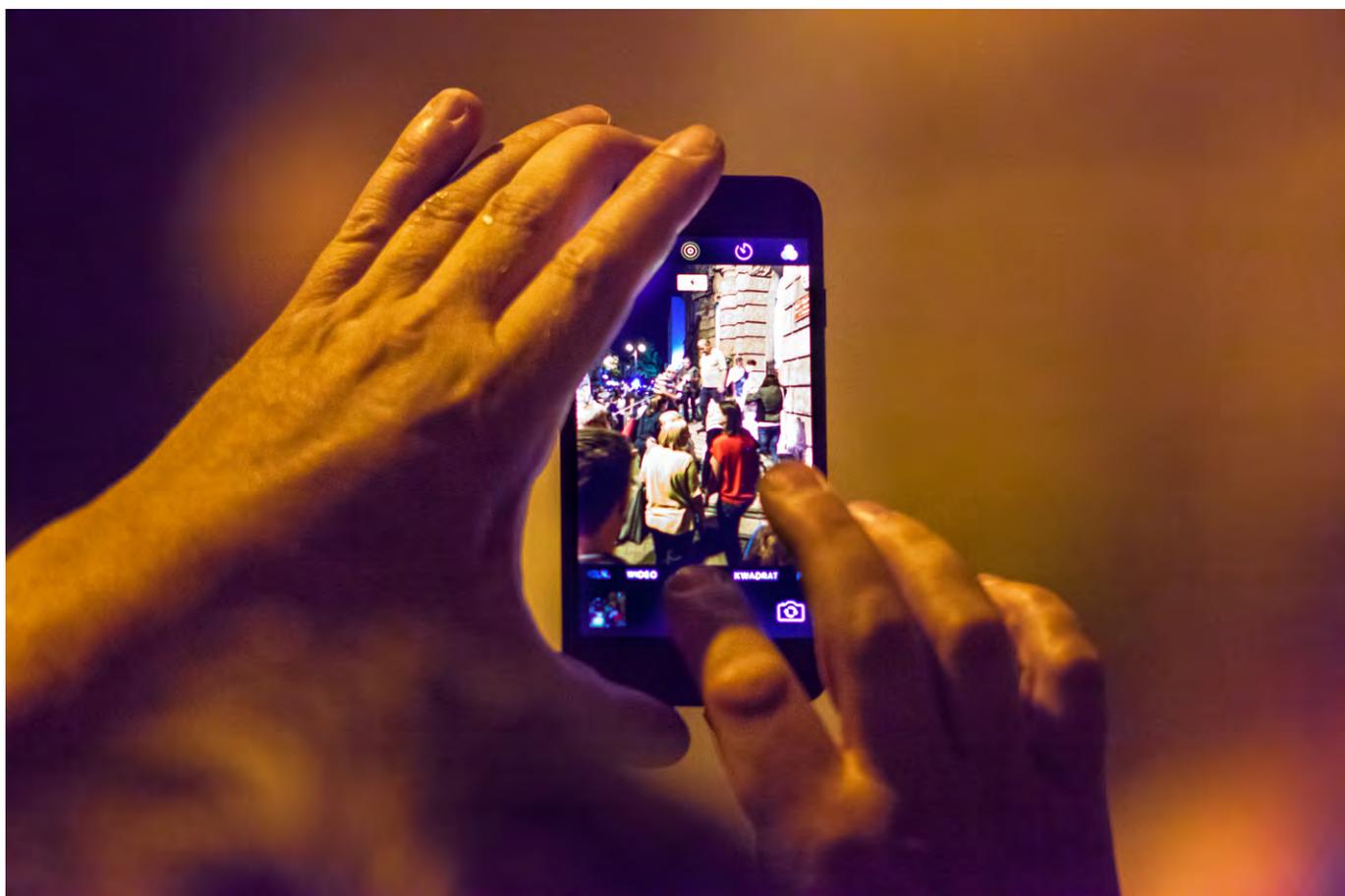
新纳粹势力的力量已经形成威胁，危险地蔓延开来，并且与政治的再现相关，此一再现形式代表了希腊的一种新现象，其形式是典型

的经济和“日常犯罪”，支持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论述，甚至是获利和权力的主流新自由主义论述（“强烈的人格”以及“有效的决策”，无视制度规则和“官僚”限制）发挥相当影响力。这不仅经常漂浮在一个空洞的论述中，也是一个容忍打群架“政治”的制度。我们要知道，民主正在倒退。■

來信寄給 Gerassimos Kouzelis <[gkouzelis@pspa.uoa.gr](mailto:gkouzelis@pspa.uoa.gr)>

# > 社交媒体与民主： 双面刃？

Haryati Abdul Karim, Universiti Malaysia Sabah (UMS), 马来西亚



手机和社群媒体成为政治参与的工具。Flickr/Sakuto. 保留部份权利。

**社**群媒体对社会最深刻的影响之一是它培力普通公民，社交生活的特点是因特网的行动主义，透过智慧手机可以轻松地让各行各业的人参与其中。这确实为公民在对匿名的前提下可以公平和自由地参与有政治讨论。这在言论自由才刚兴起的国家来说，特别具有重要性。

马来西亚也不例外。马来西亚人着迷地利用社群媒体在各种问题上表达看法，这是前所

未有的。他们习惯于讨论，分享，或上传他们的社群媒体帐户视频，并开始在朋友之间进行交流。Facebook, 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社群媒体在马来西亚人中非常受欢迎。Facebook 是第一受欢迎的，大约 81% 的马来西亚人使用 Facebook，其中近 90% 是通过智能型手机。

在社群媒体实际上“解放”马来西亚人，人们可以公开表达他们对政府的观点，就算是敏感的问题（如宗教和种族）也常见人们讨论，

>>

这这形成了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氛围，让人们参与政治。除了政治，社群媒体还使马来西亚人能够表达和创造出多元的全球在地化认同。

媒体被政府垄断的国家，因为透过收购和通过立法，替代沟通管道仍很有限。因此，人们被使用地下媒体。在公众舆论方面，与传统新闻媒体，社群媒体更有效。一个例子是阿拉伯之春，因为公共沟通短到受到严重限制，于是公众对政府和主流媒体失去了信任。社群媒体成为人民的唯一新闻消息来源，危机表达意见的空间。

在马来西亚，社群媒体带来了2008年大选期间的政治浪潮，全国联盟政府的被瓦解。BN的政治对手，当时被称为希望联盟(PH)，只有在地下媒体出现，因为它被排除在主流媒体之外。社群媒体成为PH的强大宣传工具，网络便利地传播讯息。人们加他们的Facebook成为粉丝，凸显其政见像是商品和服务税(GST)，高生活成本和贪腐等政府问题。这都引起了网络的论，并创造了一个公共领域。支持的部落课使用他们的部落格去塑造对有利的公众舆论。在最近结束的第十四届大选中，WhatsApp开始被用作Twitter和Facebook之外的竞选工具。与Facebook不同的是，WhatsApp可以亲自联络到人。在WhatsApp聊天组中就形成了公共领域，他们讨论PH的竞选新闻。这或许许这是精心设计过的策略，因为PH专注于具体问题，并一直重复，最后赢了。BN社群媒体经营很慢，因其控制主流媒体。PH的赢得了222个国会中的113个议席席位，而执政党在2018年只获得了79个席位。

若审视社群媒体，新闻自由，民主之间的关系，社群媒体是一把双面刃。网络为言论自由和赋权打开大门，也为假新闻和病毒提供了散播渠道。假新闻已成为马来西亚的严重问题。最近一次的大选里面，选民们被假新闻淹没，社群媒体没有什么真实新闻。一旦假新闻当道，那就是否定了公民了解真相的权利。过度依赖社群媒体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是假新闻散播的推手，因为人们不去查证新闻来源。马来西亚政府试图在2018年通过“反假新闻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未能明确界定什么新闻是“假”。所以假假真真，真真假假，法案

也没有真的被落实，因为新政府已经打算废止这样法案。所以到底是真是假？没人知道，人们以假乱真，所以难辨真假。

社群媒体还有一个潜在威胁，那就是中心地位的政治狂热主义者会让其他边缘位置的人遭到网络霸凌，这是违背民主精神的，其他人则因为这样的两极化而受伤。即使有人提出合理的看法，政治魔人会群起攻击意见不同的人，这是在剥夺其他人表达意见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不文明和不理性的。

若要让社群媒体成为促进民主化的工具，文明化和媒体素养必须先到位。我们必须让公民理解理性沟通的意义，唯有这么做民主才会深化。■

來信寄給 Haryati Abdul Karim  
<[haryati@ums.edu.my](mailto:haryati@ums.edu.my)>

# > 阿根廷的民主 倒退

Esteban Torres Castaños, Córdoba国立大学, 国立科技委员会 (CONICET), 阿根廷



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民主倒退  
。 Flickr/Alex Proimos保留权利。

阿根廷正历经了明显的民主撤退。如果看着军事独裁统治的崩溃和拉丁美洲左翼进步力量的消长，去分析拉美的民主，那其实很难解释这样的撤退。当代民主化被一种社会过程，在其中公共领域不断扩大。这个过程有三个关键因素：技术 -- 政治面向，技术 -- 经济面向，技术 -- 传播面向。每一个都有复杂度。在这文章中，我想简单描述一下2018年阿根廷民主结构性退却的关键事件。这些事件与政治压迫的面向以及技术经济的面向有关：国家定义其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程度。

政治压迫方面，相互加强的两个主要事件是：1) 国家行政权通过法律建立军事部队，和2) 政府在领土上建立美国军事基地。

第一次事件是这样：行政权机关通过第683/2018号法令，授权武装部队能够执行国土

安全任务。这样一来，国土安全与国防之间的已经没有差别，这加强了政府将自2015年12月 Cambiemos（执政联盟）胜利以来在国内与日俱增的社会抗议活动定为犯罪活动。此法一通过，Mauricio Macri政府试图将军队置于“反毒品贩运和反恐计划”之下，使其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完全同步。随着这项新法令的颁布，和废除了第1691/2006号法令，由国防法（1998年），国土安全法（1992年）和国家情报法（2001年）组成的法律框架于是脱钩。要知道，这些是三十年民主化的结果，是建立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识之上的。

第二次事件是政府正在推动在阿根廷境内建立美国军事基地，技术掌握在美国南方司令部手中。目前为止确定了三个地点：三方边境（阿根廷，巴西，巴拉圭），Tierra del Fuego

>>

(Ushuaia), 和 Neuquén 省。这两件事比次增强。美军今年抵达阿根廷, 与部队进行联合演习。正如两国政府宣称的, 演习的目的是提供“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贩运”。外国军队要来阿跟停需要议会的授权, 但美国军队来煤经过国会授权。

此外, 我们要注意第二系列事件, 这些事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让政府完全丧失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Macri 政府一直有外部负债的政策。两个关键指标是外债相对于阿根廷国民生产总值, 以及与债权人作出的承诺。前者可以看到 Cambiemos 在新的金融体系内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外债成长。Kirchner 政府 (2003-2015) 让国家经济政策在通过在与债权人的谈判中去采取措施以便减少外债。改谈判的成功让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也允许放弃 1976 - 2001 年的金融体系。从 2015 年 12 月起 Macri 政府将强制性的外债看成整顿新财务系统的关键方式。自 2011 年以来, 外部公共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在增长, 当时是自 1983 年民主化以来的最低水平, 是 14.2%。于是债务开始快速成长, 在 Macri 执政时快速上升, 直到 2018 年 6 月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65.5%。所以阿根廷的债务系数上升速度可谓创下历史新纪录。本土和外币的债务总发行量已达到近 1330 亿美元, 这使该国成为 2016 - 18 年期间世界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主权债务发行人。

与债权人的关系方面, 新债务周期中的主要事件是在与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达成债务合约 14 年后, 阿根廷决定重新订定合约内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是在备用贷款的要求中发挥作用的。阿根廷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前备用贷款相比, 这笔巨额贷款 (500 亿美元) 的新的地方式不仅要考虑税收和货币目标, 还要监督通货膨胀。这样一来, Macri 总统实际上将国民经济的自主管理权让渡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于是变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的信徒。

军事美国化和高负债正在侵蚀国家主权, 并在国内造成大规模抵抗和示威。反对派力量涉及各方的社会运动组织, 这些行动抗议民主的倒退。虽然民主化支持者与新的全球化借贷制度的支持者之间, 权力关系显然后者趋于劣

势, 但中期的国家政治前途很难说。要记住, 仅仅描述目前的民主到对并不足够, 重点是从民主的复杂度中找出新的社会抗争和创造历史的革命理论。如此一来, 我们重新可以看到新的左翼进步政治纲领, 带领我们迈向拯救民主成果的进步道路上。■

來信寄給 Esteban Torres Castaños

<[esteban.tc@conicet.gov.ar](mailto:esteban.tc@conicet.gov.ar)>

# > 埃及革命中女性地位的抹去

Amy Austin Holmes,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于开罗，埃及，Harvard University 访问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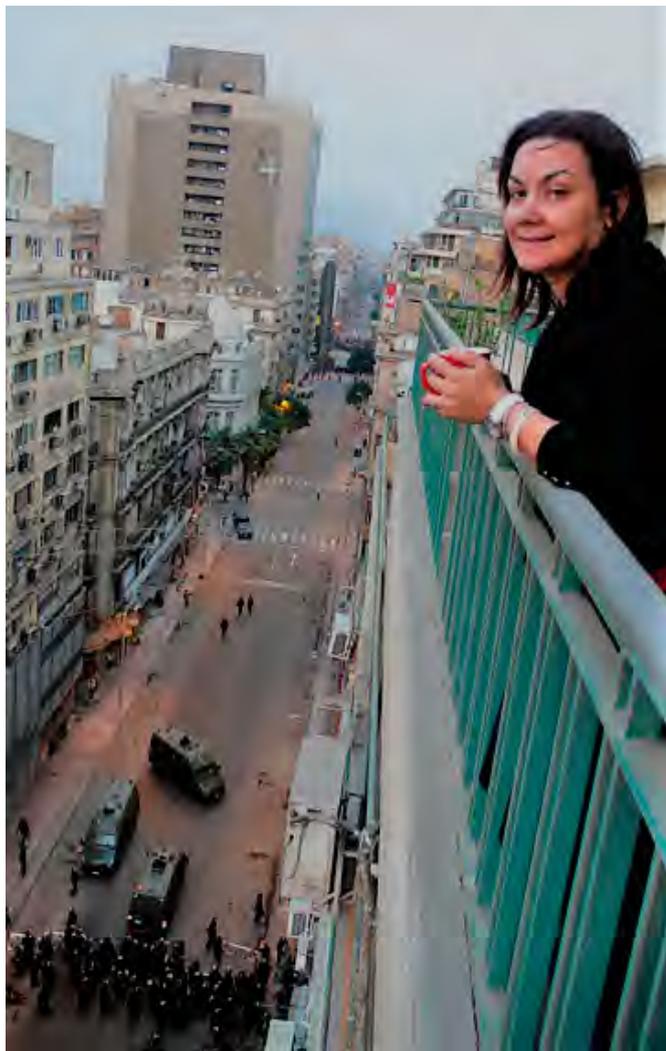
Flickr/lokha. 保留權利

阿拉伯之春引发多数学者对革命研究的新兴趣，他们被解放广场上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所吸引。尽管文献已经满山满海，但女性往往在研究中缺席。H. A. Hellyer 的书《A Revolution Undone》中以埃及革命中 27 位核心人物的词汇表中，只提到一名女性，另外 26 名都是男性。Philip Marfleet 的《Egypt: Contested Revolution》封面上有一位女性，但内容并没有多少女性的身影。其他著作论及女性时主要是聚焦在骚扰或暴力的受害者的角色，但鲜少讨论女性作为历史的推动者。要找有关阿拉伯之春研究的女性身影，那我们必须到别处进行搜索。我自 2008 年以来一直住在埃及的开罗，几乎亲眼目睹每次抗议，每次静坐，每个事件。但是，妇女正在从埃及革命的历史中被抹去。“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很可能被建构成完全没有女性，我们要还原历史真相。

女性不只是倡导女性的权利而已。从 Mubarak 独裁统治到多年的动荡时期，女性经常站在埃及革命活动的前线。早在 2005 年，

为了在埃及的专制政府中导入课责制，三名女性成立了一个监督总统和议会选举的小组。其称自己为 Shayfeencom，意思是“我们正在监督你。”其中一位创始人 Bouthaina Kamel 后来成为现代埃及历史上第一位竞选总统的女性。在革命之前，Nadeem 是一个埃及唯一致力于治疗酷刑受虐者的组织，其由一位女性 Aida Seif El-Dawla 博士所创立。在 2011 年 1 月 25 日之前的一周制作了病毒节目，让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的就是 4 月 6 日青年运动的核心人物 Asmaa Mahfouz。

在 Mubarak 被驱逐之后，埃及被军方最高委员会所领导的军政府统治了一年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述的，革命最激进的要求之一就是结束军事统治，不是改革，不是渐进式革命，不是撤除独裁者，而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结构：自 1952 年军政府成立以来，要做的事情是在军政府内设立文官制度，但是埃及军方基于男性征兵为主而治理，所以女性被排除在该政治过程之外。反军事组织中的许多主要抗争者都是女性，也就可以理解。废除军政



Bouthaina Kamel (受拍者)是第一位角逐埃及總統寶座的女性候選人。著作財產權：Amy Austin Holmes.

府团体要求停止将平民纳入军事法庭。该团体的一些主要人物有 Shahira Abou Leil 和 Mona Seif。另一个团体通过公共领域的放映影片去揭露军方犯下的许多侵犯人权行为。这个团体叫做 Asker Kazeboon，意思是军方式大骗子，由科普特基督徒 Sally Toma 创立。

女性通常是透过谈论对性别暴力去来破坏社会禁忌。Samira Ibrahim 针对被军方拘留妇女进行童贞测试进行大肆批判。Heba Morayef 则是当时埃及人权观察的领导，也是唯一被列入 Hellyer 词汇表的女性，其领导抗争童贞测试的社运。妇女在倡导男性权利也发挥很大影响。埃及人权倡议组织 (EIPR) 研究员 Dalia Abdel Hamid 是埃及境内少数批判 2017 年秋季对 LGBTQ 镇压的异议者。

女性也一直是埃及反对派媒的先锋。Lina Attallah 是 Mada Masr 的创始人和主编，Mada Masr 是一家新闻网站，“卫报”在 2015 年报导其在埃及新闻自由中的贡献。Mada Masr 因

为这样被被政府封锁，并且持续受到审查。

新一代努比亚社会运动者有几位杰出的女性。Fatma Emam 于制宪法委员会中工作，并成功让努比亚在埃及宪法中被提及。她是部落客和研究员，特别关注敏感的问题，包括军方在苏丹边境占领努比亚土地。2017 年春天，来自 Aswan 的年轻女子 Seham Osman 成为第一位宣布有意竞选努比亚总统的女性，之前其因为受到关切而退出竞选。

最后，埃及最著名的人权律师之一 Mahienour El Massry，她以捍卫所有埃及人的权利而闻名。其中一个案例包括 21 名穆斯林兄弟会的女性支持者。这很特殊，因为她本人是对兄弟会的大力批评者。此外，她也为叙利亚难民辩护，坚持在警察局旁边过夜，确保难民不受酷刑或虐待。2014 年，她获得了 Ludovic Trarieux 人权奖。（曼德拉在 1985 年获得了该奖项。）

如此简短的文章其实很难公平地讨论这个议题。许多的女性不能谈论此议题。Nermin Allam 的女性和埃及革命是可以找到更详细的分析。但是我希望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倡导女性的权利而已。他们是更大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女性从革命历史中抹去，或者将她们归类于性别研究领域，其实只是让她们一直以来反抗的父权结构永远存在。■

來信寄給 Amy Austin Holmes <[holmes@aucegypt.edu](mailto:holmes@aucegypt.edu)>

# > 全球治理：

## 民主的世界秩序？

Peter Wahl, 执行理事, 世界经济、生态、发展协会 (WEED), 柏林, Attac Germany创始人, 德国



Arbu繪。

20世纪90年代有个概念相当风行：全球治理。这指涉了一种新形民主的全球体系，更人性化的全球化过程。概念本身的演变相当有趣。

首先，进行治理的不是政府。法国版本概念，gouverner，意味着转向，调度，整理。内容上有下面几个重点：

- 全球化的经济过程和政治脱勾，导因于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新自由主义要求市场的自我调控，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

- 新的全球化问题，例如气候暖化等，解决方案超出了个别民族国家的能力范围。

- 国家之间的问题，例如集体安全，军备竞赛，核能管理等需要采取新的取径。

- 通过正式和有约束力的协议，以及非约束性标准制定，自愿协议和多边协议相结合，形成全球制度，形塑新的政治治理典范。

- 以上这些都需要国际体系中的行动者，也就是政府，多边机构，商业部门和公民社会等的新互动，需要包容，合作，对话，连结，协商，利益平衡是重点。

冷战的结束后，全球治理的概念似乎具有现实机会。全球治理有了舞台可以发挥，渐渐受到欢迎。1992年联合国里约会议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议，有100多位国家元首和公民社会的人士，可说是全球治理的象征行动。里约会议是“单一共同世界”论述的滥觞，可以和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和左派的国际主义结盟。

不过幻灭的也很快就是了。五年后的第一次评估会议上，明显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版本并没有兑现其承诺。世

>>

界繁荣只是假象。反而有许多的到对。有趣的是许多受害者都是经济不错的国家，要知道当时许多受害者都极度右倾化。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的抗议就是最好例子，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全球化的缺点，其中包括对社会公平，环境，民主的威胁。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版本赢了。2008年，金融资本市场可以自我调节的说法破灭了。资本主义已经失去控制，导致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治理甚至无法影响这一进程，更不用说扭转局势了。

全球治理无法被落实到经济领域，而全球治理的精神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不了作用。因此，1997年为了对抗Yeltsin的俄罗斯统治，北约往东扩张。1999年，当北约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再南斯拉夫开战，这造成了一系列单方面强权政治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9/11之后的“反恐战争”，以及全球“意愿联盟”对伊拉克的攻击，2008年北约保护下的科索沃的单边宣告独立，以及2011年利比亚政权的改变，这些都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可会大大地背道而驰。

所以，若后来出现反作用，那也不用太惊讶。特别是俄罗斯中国越来越受到这些事件的鼓励去摆脱冷战后的秩序。这不是暂时的，是以国际体系的深刻结构转型为基底的。我们现在正在迈向多中心世界秩序的阶段，基本上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俄罗斯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地球经济重心整个转向亚洲，以及（相对）对美国和西方主导地位的没落。

国际上出现了新的秩序，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或金砖四国。他们建立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投行(AIIB)，要去取代国际货币基金，并设想像一带一路这样大规模的基础建设经济方案。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并行结构的出现，例如中国和俄罗斯的SWIFT替代系统，全球金融的电子神经系统，以及打破万事达卡，Visa和美国运通卡的垄断的信用卡系统。这些新贸易协议通过双边协议去取代美元，从而破坏了美帝霸权。这是对全球化的反击，其中一个重点是一种“选择性去全球化”。

当然，新的世界秩序也可能有新的风险。于是移民和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冲突和不稳定。随着川普政府极端单边主义“让美国再次伟大”，风险可谓前所未有。

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全球治失败了，答案有几个：

- 我们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中的权力宰制忽视不见，马克思说得好，经济关系俨然是无形的暴力。

- 我们对对国际体系中的政治权力关系也忽视了。

- 我们对国家太乐观了，资本主义仍然是典范。

全球治理从最早就太过理想化了。不过国际合作的想法仍然可行，不应该放弃希望，放弃结合理论和实践。但是，如果要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那是需要仔细想想要跟谁一起合作，以及怎么合作去实践。

來信寄給 Peter Wahl  
<[peter.wahl@weed-online.org](mailto:peter.wahl@weed-online.org)>

# > 杰出的知识分子

Nicolás Lync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秘鲁



27

| Aníbal Quijano於2015。Creative Commons。

Aníbal Quijano (1928–2018) 是秘鲁和拉丁美洲的杰出知识分子，他很有原则。当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从事社会学研究时，其对现状的批评相当犀利。Quijano 从未屈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危险和野

蛮，在 20 世纪 90 年代，正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他对社会阶层的批判解释了当代秘鲁和整个拉丁美洲的社会变迁，贡献很大。

Quijano 主要在秘鲁的 Lima 的 University of San

>>

Marcos 以及拉美和美国的其他大学担任教授和研究员。由于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与 *Sociedad y Política* 期刊介入政治斗争，于是被 Juan Velasco Alvarado 的军事政府驱逐到墨西哥，成为一位致力于为秘鲁以及全体拉美人民斗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致力于找出形塑我们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的深层因素，并探讨其转变的机制。

他的第一个贡献是在认识论的层次。Quijano 为拉美的社会进程提供了“根植南方”的解释。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摆脱了功能论社会学的传统/现代性二分法，并以历史/结构异质性为主要论述主轴。他认为拉丁美洲社会中存在一系列生产是围绕资本而成，这种现象不仅是国家的，也是跨国的，更是全球的。

因此，Quijano 解决了拉丁美洲依赖的问题。虽然他拒绝提及所谓的“依赖理论”，但显然他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 Raúl Prebisch 和 CEPAL（英语为 ECLAC）开创的论述的一部分，然后由 Cardoso 和 Faletto 传承，最后由 20 世

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 Ruy Mauro Marini 接下棒子。他参与当时的辩论，对城市规划和劳动力做出了理论上贡献，三十年后他通过权力殖民地的概念对拉丁美洲的全球特征做出了深刻的解图。

可是 Quijano 也对拉丁美洲身份认同问题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在秘鲁的 *cholificación* 之研究，到他对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的著作的关注。后者是伟大的拉美批判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此外，他也同情原住民的斗争以及目前由各种民族运动所促成的抗争。

他在对认同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关于种族这个概念的思辨。Quijano 认为，这个概念起源于欧洲人对美洲大陆的殖民，然后成为美洲的社会的阶级划分基础。身份认同奠基在种族上面，统治权力也是。总之，种族的观念是殖民政权的核心。Quijano 认为，权力的殖民性来自外部统治的需要，殖民地或新殖民地的帝国霸权是统治精英对被殖民社会内部统治，之所可能是透过种

族差异的建构。所以，权力的殖民性成为在拉丁美洲本土民族主义或是多民族国家的主要威胁。

如同我们看到的，Aníbal Quijano 的理论创新和他在自主公民社会的思想中的地位，让他成为秘鲁社会学和拉美社会学的指标人物。■

來信寄給 Nicolás Lynch  
<[nicolaslynch54@gmail.com](mailto:nicolaslynch54@gmail.com)>

# > 战士的喜乐

Raquel Sosa Elízaga,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 墨西哥

哥 斯达黎加大学授予 Aníbal Quijano 荣誉博士学位，即使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英雄也感到惊讶万分。当时全部的人起立鼓掌时，他感到更加惊讶了。他非常感谢台下的观众“熟悉他的研究”，分享到：认识来自于生活“赋予一个人所思所著的意义。”他以谦卑和简要向大家分享其座右铭“用力生活和抗争。”最后补充说：“我们无法活在一个权力，剥削，暴力充斥的世界。”

我是很久以前认识 Aníbal Quijano 的，那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他流亡来到这里。他反帝，支持斗争，认为需要在美国，亚洲，非洲建立斗争战线，他对全世界每一位女性，年轻人，原住民，移民，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斗争表示同情，所以他走遍世界，并在学术界以外相当受到欢迎。

他的抗争史让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回到他的家乡秘鲁时，也就是独裁者藤森命令军方占领大学之后，放弃了他任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的系主任职位。于是他再一次流亡到 Binghamton University，巴黎，和其他地方。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秘鲁的 Ricardo Palma University 慷慨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成为他最后几年抗争战斗的规所。他的一生不

## “他人生的座右铭：用力生活与抗争”

停地组织抗争和参与学术活动，涉足政治和教育，不断向人们伸出援手。他与许多与他一起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合作撰写了许多文章，其中包括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他的亲密战友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他对殖民地的看法受到全球的认可，其思想根植于政治和学术上的斗争。事实上，我会说那是道德的使命与召唤，是一个人的理想，尊严，是主体。这是一种知识的召唤，一种方法论，一种抗争的武器，为的是让被的摧毁是争的地方，被剥削的人民，被排挤的族群发出正义的声音，对抗帝国无所不在的压迫与剥削。

正如他系谱上的前辈知识分子，Aimé Césaire, Frantz Fanon，特别是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Aníbal Quijano 为他的作品带来了真正的历史意义，显示了自十六世纪以来世界革命的路径，因为种族主义和奴隶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力。理解和谴责这种压迫和异化永不停歇，是他日常生活的抗争主轴。从潮流中解放出来，但不孤独，超脱了政

治迫害的痛苦，他是喜乐的战士。他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他知道他正在为一个比他更大的理想而战斗。他喜欢生活的美丽，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一起，感受到了无以伦比的抗争与生活力量。让我们庆祝他的伟大，决心，与正义！■

# > 后种族隔离时代的贫穷

Joshua Budlender,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美国



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和Nelson Mandela在1992年的Davos世界经济论坛。图：世界经济论坛

**很**显然的是尽管南非的黑人在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时多数获得了自由，但经济自由仍未取得。这种说法通常非常笼统，或是太过于学术抽象。我在这篇文章中提供证据，解释南非贫穷问题的变化和趋势。

## > 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贫穷率

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一点是，在后种族隔离时期，被归类为“收入贫穷”的南非人口比例几乎没什么变化。具体数字取决于所使用的贫穷线为何，但通常50%至65%的人口被认为是“贫穷的”，这比1994年提高了仅有几个百分点而已。但是贫穷率仍然和种族高度相关。人口调查指出73%的非洲黑人，48%的有色人种，12%的印度人或亚洲人，以及2%的白人收入是低于贫穷线的。

贫穷人口的减少主要是由于政府提供了所谓的“社会补助金”，而这在后种族隔离时代

扩张很快。这个补助金是给某些类别的穷人的现金，可无条件花用。对于南非最贫穷的40%家庭而言，社会补助金通常会占到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后种族隔离时期物质条件的改善还有另外一个来源，大型公共项目提供了自来水，电力，和学校教育的可取得性，让营养不良和死亡率显著下降。这些领域的改善部分反映了极端种族隔离时代的对于特定族群的忽视和剥夺，但不可否认的是大有进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更是如此。

可使虽然有这些重大改善，极端贫穷仍然普遍存在于农村，特别是过去曾经历种族隔离的“家园”。当用相对剥夺指标去看南非的贫穷时，最严重的贫穷地区往往是种族隔离的遗绪。

可是贫穷当然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而已。非城市的家庭要脱贫的机率稍微高过于浓村家

>>

庭，但仍有结构性的限制。城市黑人劳工及其家眷在种族隔离时代被迫迁移到遥远的外围，被剥夺都市的工作机会和便利。在种族隔离后，私人财产权和政府政导致了国家补贴住房建在廉价的外围土地上。由于服务不足的公共交通系统加剧了这种情况，南非工人的通勤时间很长，通勤成本也很高。“运输税”因此高达工人工资的40%。这样“种族隔离城市”使边缘人口很难生存。

### › 工作少工资又低

南非的劳动力市场功能失调是种族隔离后贫穷持续存在的关键因素。虽然失业率吸引了媒体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但是极高的数字让这现象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按照“狭隘”的失业定义来说，南非的失业率在25%至30%之间。根据“广义”的定义失业率在40%左右。

大规模失业是不应被低估的，不过这个议题通常转移了人们对南非超低工资的焦点。家庭工资收入少家庭中，50%南非贫穷线在贫穷线之下，虽然所得分配的顶端有所增加，但自1994年以来工资中位数一直停滞不前。民族志研究也表明了南非工人经常辞职，主要是因为工资太低而无法支持物质和心理的花费（通勤成本和歧视），所以就算失业也就算了。

那么，什么导致了高失业率和低工资？多数人会说人力资本，即教育。这个说法认为南非正在经历“技能不符”的情形，即雇主越来越需要高技能工人，但基础教育无法训练出这些技能。尽管入学率在上升，可是南非基础教育状况百出。例如，每十名四年级学生中就有八名学生不具备阅读能力。不过呢，教育不是问题的全貌。

要承认的是私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充足。随着种族隔离的结束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以前被限制移动的黑人可以有机会到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这时是劳动力的需求大过于供给，导致结构性失业鸿沟持续至今。虽然企业经常抱怨管理的风险很大，但数据说明了南非私营部门的特点是工人流失率特别高。同时，对劳动力的不足的需求也可能与私营部门固定投资水平低有关。通过收购而非生产性投资去扩大业务，这种作法在后种族时代无以为继，被大股东和海外资本转移所取代，可是内需投资也没有增长。

### › 不稳定和动态贫穷

自1994年以来，南非一直遵循外包和“劳动中介”的方式，导致不稳定的工作形式日益普遍。对南非贫穷的动态分析表明，40%的非贫穷家庭“容易受伤”，面临着未来陷入贫穷的巨大。80%的贫穷家庭由于前途堪忧，被列

为“长期贫穷”。

可以说的是，实质性经济自由在南非仍然不存在：现实说明了一切。然而，在南非，我们更要去想，解决此问题有赖对种族隔离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毫无疑问，社会补助金和服务的进一步扩张是可行的。然而，南非劳动力市场是经济问题的关键，若要破坏种族隔离的历史宿命，那势必要采取行动。■

来信寄给Joshua Budlender

<[jbudlender@umass.edu](mailto:jbudlender@umass.edu)>

# > 后纾困福利政策

## 希腊的新贫穷地景

Vassilis Arapoglou, University of Crete, 希腊



墙上画满了贫穷的图案，而餐风露宿也已经是常态。  
Credit: Vassilis Arapoglou.

**經** 過八年嚴厲的擲節政策，希臘政府預計後救助時代並推動其“未來成長計畫”，這是一項與歐元集團，歐盟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談判的計劃，關於退出財政援助計劃後續的財政監督形式。此計劃強調了希臘對改革的主導權力，試圖將“公平和包容性成長”設定為優先討論事項。

本文是要说明通过将计划纳入更广泛的框架，并呈现我最近对希腊城市贫穷研究的结果，比较政策的可行性。“后救助”论述可被视为“后福利”政策的一个特殊产物，这是一项社会权力向下开放的政策，已经在全球许多国家发展开来，虽然脚步不一，但是被欧盟采纳了，用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放松管制和社会权利的收缩。后福利涉及在社会安全网和社会

包容计划，鹰及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关系。社会政策的不妥切成了政治的焦点。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目的是地方和自发组织及其客户转变为人力资本，投资者和，和消费者。另一方面，渐进式的方法目的是反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将福利措施，把公民社会纳入市场。倡议的目的在于整合培力基层，在地资产和资金，在公卫、护理，住宅，经济，城市生态等新领域注入能量。

在希腊，前两个救助协议的目的是故意贬低劳动力和劳动人口价值。2010年开始的坏经济情况已经在过去两年中减少，但是目前欧洲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这种情况无法完全彻底根绝。以2008年的标准来看，2016年的贫穷率接近50%。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我们在该

>>

国使用 2008 年的标准，希腊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但即使使用目前的收入标准，年龄不到 25 岁的人口中几乎有一半不是贫穷就是非常贫穷，在不然就是失业。年轻人的兼差行为暴增：25 名 25 岁以下的员工中就有一个是兼差的，五分之一的员工属于新贫族。希腊退出了救助协议所以不平等加大，有一半的年轻人是贫穷或处于不稳定的生活状态。新的贫穷最重要的是影响了年轻一代，移民，城市居民。

我近期研究的成果（“Contested Landscapes of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in Southern Europe: Reflections from Athens”一书）说明了短是的政策如何主导宰了当地的反贫穷方案。引入“社会连带收入”一计划已经发挥很大影响力，但收入增长很有限，一味强调工作的方式限制很大，资源也缩减，在地和公民社会为了生存，要去想办法怎么吸引头资。该强调的是，救助计划不仅取消原本就不强的制度，而且还形成了一条特定路径，让公共设施私有化，慈善事业化。

最令人气馁的是你会发现人们会在“新穷人”的群体之内去区分，且中产阶级很能同意这种分类（因为他们代表了一种贫穷的命运共同体），被边缘化人，是吸毒成瘾者，精神病患者，非法移民，迁徙的人等等，地方政策不仅不能帮助他们解决物质上匮乏，而且还定义了贫穷人口的象征分类，去避免中产阶级的罪恶感和害怕。

相反的是，公民社会内部的多元使会让人对市场逻辑和旧的济贫法提出挑战。希望的氛围是有的，是为了让那些无法被分类的人可以融入。非正式的支持也有用，在地的运动欢迎来到希腊城市的难民，反对矛盾的欧盟移民政策。

然而，“自发性”或“善意”并太好去改变，特别是当基层倡议面临欧盟的怀疑，或是必须面对官僚体制的时候，特别是如此。和大众看访不同的是，公民社会历史上活跃的领域，像是志愿部门，专业协会等都会和基层倡议合作，国际宣传组织或运动建立联系的领域，需要数年的经验才能积累一定的知识。可是还有绝大部分并不没有被发线。威权主义者和侍从主义者的心态仍然普遍存在于政党内，把国家当作党的延伸，贬低社会，迫使那些异议噤声。

希腊“公平和包容的成长策略”可被视为

改善政策，并去和欧州的制度进行协商福利的成果。公民社会团题则批判该策略不够透明，没有为改善贫穷问题制定具体目标，没有宣传有益价值观，也没有评估可能的社会影响。同样地，“年轻人的经济和社会融入”和“社会导向的经济”等计划没有优先权，缺少支持。惊讶的是，及难民和移民融入的问题并没有被彰显。这些计划确定了与委员会谈判的议题，包括恢复集体议价和最低工资等等都是劳工运动者关注的问题。但是的反动的劳动立法，低收入户和年轻的自营职业者的税，以及延期退休金的删减，并借贷方达成协议等等，都相当不容易。有鉴于此，地方公民社会去为政治和经济权利的奋斗是唯一的乐观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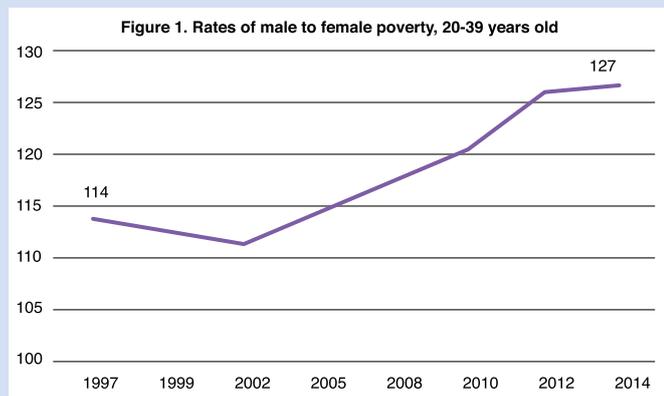
來信寄給 Vassilis Arapoglou  
<[arapov@uoc.gr](mailto:arapov@uoc.gr)>

# > 为什么拉美的女性贫穷比率教高？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ISA 贫穷、社会福利、社会政策研究委员会(RC19)成员

## > 脉络

从 1998 年开始到 2010 年中期，拉丁美洲的“左倾”或“粉红浪潮”受到瞩目。选举带来了进步的动力，劳动权益和社会政策的要求日益增加。



来源：以ECLAC资料为主的诠释，CEPALSTAT, 2018。

左倾来自于人民对早期保守政府未的失望。幻灭与经济繁荣共同出现。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表达了对改革的诉求，希望改善生活条件。到 2000 年，拉美其实取得了公共政策的大幅进步。

## > 国家行动

粉红浪潮期间，经济政策和需求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一番的改革，制定提高最低工资和增加正式劳动比例。社会公共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例增加了，从 2000 年的 49% 增加到 2014 年的 58%。平均而言，加勒比海地区（拉美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报告指出，人均支出从 2000 年的 687 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619 美元。尽管各国的增长幅度各不相同，但整个地区都出增加了，新改革措施也有类似的变化。

社会支出的大多数都是有利于妇女

的，并藉此取得国家资源。拉丁美洲的国家多数针对针对妇女和妈妈的政策进行介入。透过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s)和延长养老金发放率等政策让妇女的收入增加了。这些国家政策与作为仅仅是丈夫家属获得的福利相比，是大幅改善了妇女按的生活条件，获得老年福利的机会也增加了。此外，对于产妇的福利也增加了，慢慢地开始重新组织除家庭以外的的无常照护劳动的女性，劳动市场的增加后，妇女的生活改善了。

## > 劳动市场和国家整并

2000 年代期间，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有额度限制，女性劳动参率与总人数都因此减少，但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 24 至 59 岁的妇女之中，其劳动力参与率接近 90%。所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加需要考虑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可是这些妇女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也面临结构性障碍。女性的总体变化模不完整，但收入不平等也在女性群体中也有异质性。

21 世纪初基于不同的原因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率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妇女中有了障碍。最糟糕的情况是性别分工早其和较高的生育率，有限的照顾劳动市场和资源等等导致了参与率达到顶峰。性别分工让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通过降低和延迟生育率去市场获得照护服务，好达到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标准。家庭结构的改变

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人口革命之后，家庭结构也经历了彻底的改变。新夫妻

>>

关系代表了更多的家庭组成和退场机制，以便享有更好的权利和责任分配。虽然家庭数量较少，不过重点是既有的家庭并不稳定且容易瓦解。

随着家庭的减少，核心家庭也减少，单亲家庭，同居，同性伴侣和其他家庭形式增加。离婚率的提高是这些转变的一个指标。图2代表了双亲，丈夫为主要的家庭比例的下降，妻子为主要的家庭比例的增加。根据定义，家庭单位既合作又冲突。家庭制度的变革挑战了由成年人共同养育后代和照顾彼此，防止后半生风险的家庭制度。这突显出了新旧制度之间的冲突。结果是与父亲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小朋友人数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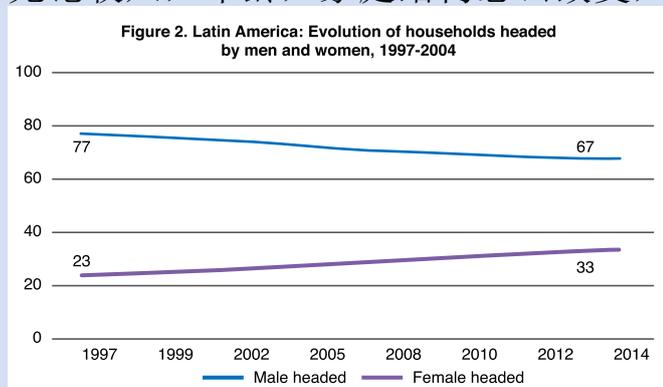
家庭制度的转变对所有人都有重大影响。国家总体经济统计显示了拉丁美洲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消费来源至少有60%来自私人转账。儿童的经济保障和照顾母亲大有关连，这通常也关系到儿童的监护人。妇女照顾，养育孩子，健康检查等的一系列育儿责任都受到影响。这样的需求，加上价值和消费来自家庭，通过女性的无偿照顾劳动和家务劳动得到补偿劳动力缺口。研究指出无论收入，年龄，家庭结构怎么改变，

影响很大，男性呢？男性在劳动市场参与上几乎没有变化，女性反而在无偿照顾和家务劳动率增加两到三倍。此外，当家庭瓦解后少有孩子与父亲同住。这种不平等的家庭劳动分工对妇女的资源取得有负面影响限制了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例如有偿工作）并要和事业保持距离以适应家庭需要。收入差异也限制了妇女将其无偿家务劳动部分转为有偿家庭工作，也包括女性工作的能力，这是拉丁美洲不平等收入的核心特征。

### > 启示

家庭结构改变了之后，更多的父亲放弃了夫妻关系之外的角色。而国家直接介入儿童的物质福利，产生了对适应国家法律和政策的需求。国家发展那些能够让越来越多离婚家庭，单亲家庭，双薪家庭，同性伴侣家庭，以及更多易受贫穷影响的儿童和妇女的需求的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此外，这种广泛的家庭结构相关的法律承认和平等权利要求国家的介入，让家庭和国家可以合作，超越反贫穷现金转移取径。总而言之，这对包括左翼政党在内的所有政治行动者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來信寄給 Juliana Martínez Franzoni  
<[juliana.martinez@ucr.ac.cr](mailto:juliana.martinez@ucr.ac.cr)>



來源：以ECLAC資料為主。

没差。

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与变化受到

# > “慈善经济”

## 在福利国家的阴影下

Fabian Kessl,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德国



在德国，数以百万的人使用浓汤厨房，慈善衣服，食物分配点数，食物银行。Creative Commons

2017年12月，德国Essen的一个食物银行Tafel的董事会决定限制移民顾客的服务使用。因为一位年轻移民的不当行为，食物银行拒绝让没有德国护照的人进入。这种种族化的限制引起了国际的注意，其种族主义的倾向遭到严重批判。Essen的例子显示了社会问题的本质，因为问题并不是关于Essen的贫富差距，而是一种新的差距：“进出”的差异，也就是“贫穷的养老金领支领者”和“自信的年轻移民”之间的对立。在民主社会的脉络下，其转变是必须被公开和学术地讨论的。然而，在这个辩论中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欧洲大城市的地方食物银行的。要知道，这场辩论触及了为什么21世纪的人在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和北美国家会使用食物银行这样的问题。

德国的食物补助官方数据仅仅是根据德国食物银行协会（Tafel Deutschland e.V.）等国家协会的内部数据。该协会报告指出，2016年有934家地方食物银行，但这只包括成员数量。若我们纳入那些对于服务“有需要的人”的组织，我们会发现欧洲各地有更多类似的组织。德国就有数百万人就使用是浓汤厨房，慈善衣服，食物配送点，以及其他食物银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德国的16州中，只有5州可以找到大约5,000到6,000个类似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来（或更早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扶贫体系，该体系可称为“新型慈

>>

善经济”。

“新的慈善经济”指涉了一种再分配体系，其中的基本商品免费，或是通过志愿者或低收入者打折卖给“穷人”或“有需要的人”。系统依赖于从以下三个来源去提供日常消费品：工业生产过剩产品，因法规而无法再销售的商品；二手的商品。

“新型慈善经济”主要是服务那些没有资金参与资本主义货物分配制度的人。可是，该新经济形态主要是为日常生活基本商品，所以，这种形式曾是福利国家的专利（像是在二十世纪中叶欧洲或北美）。福利国家的社会保护体系中，因为法律要求的物质供给缺口主要通过现金和服务补足，可是“新型慈善经济”将非货币利益与法定社会保险，供应或福利结构结合起来补贴有需要的人，甚至会取而代之，起可用性不是基于权利，而是基于接受慈善捐赠的善意。“新的慈善经济”透过这种改变将减贫转变为扶贫：捐助者和帮助者都是以同情为基础而不是“陌生人之间的团结”（Hauke Bunkhorst）。这种形态允许人们短暂关注他人的贫穷问题，而不是制度性的支持其脱贫的权利，这是所谓的“新型慈善经济”。

可是，如同我们从工业主义的到的启示一样，慈善不仅是以忠诚和同情为基础，“新型慈善经济”也是种次要经济体系。慈善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密切相关的，促进了剩余价值的再利用。这种再分配对于捐赠基本产品的人来说是有经济利益的，因为他们的捐款获得了相同的利润。例如，食物折扣店仍然可以从捐赠的商品中获利，因为（a）它可以降低处理成本，并可能节省一些税收；（b）作为赞助者的企业可以通过捐赠去实践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形塑正面的公共形象。

因此，“新型慈善经济”显示福利国家的阴影。与公众形象相反，食物银行，浓汤厨房，慈善衣服等并不是公民社会唯一的自发行动。我们的研究发现德国的“新慈善经济”中90%的组织提供物质援助和

广泛的社会服务，这和正规福利国家有很强的联系，因为通常是赞助，公共资金，会费，利润或服务费。还有对捐赠者经常进行经济状况调查，“新型慈善经济”与福利国家的服务体系联系起来的正是公部门对个人情况的评估结果。在公共社会和福利机构与“新型慈善经济”服务之间的间接合作中可以观察到这种情况。例如，就业中心和职业介绍所的工作人员会向有需要的人告知哪里有服务提供点，例如食物发放。这建立了一种新的辅助关系，即较小的单位在下一个更大的单位前提供援助。公共行政人员将“新慈善经济”的服务理解为福利国家福利的补充，甚至是替代，即使没有法律基础。

“新型慈善经济”很可能会成为公民社会，经济，国家之间新的分工的典范，其各自的界限和行动逻辑都有重迭地带。因此，我们正迈向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的正确道路上。■

來信寄給 Fabian Kessl  
<[fabian.kessler@uni-due.de](mailto:fabian.kessler@uni-due.de)>

# > 食安的论述

## 对于21世纪的挑战

Mustafa Koç, Ryerson University, 加拿大, ISA迁徙研究委员会(RC31)和农业与食物研究委员会(RC40)成员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食安摇身一变成为显学，成了全球解决所有人食物供应和可取得性的最首要的事情。联合国食物及农业组织(FAO)在1996年世界食物全球大会上定义了何谓食安：“无论何时何地人们的食物都是安全的，包括物质，社会，经济上都取得安全和营养的食物，满足营养需求和健康生活的标准。”“

虽然FAO等国际组织都普遍认可，但食安仍是个令人困惑的概念，因为其多重定义和优先级这几年来变化不断。食安论述的这个特质也反映了市场经济中应该怎么管理食物获取和竞争，以及食物供给系统之改变，以及政策上的摇摆。

20世纪80年代以来，食安的概念受到

了来自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国家等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政策被用来解决金融危机，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影响工作条件，国家在经济的角色限缩，去管制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盛行。这都导致制造业萧条，而且非正式劳动集中在服务业。社会福利削减让事情更遭，导致贫穷率和食物风险率上升。

新自由主义的食安论述从早期的权利论述演变成市场导向的论述，食品变成商品，食物风险视为个体的归因，和农业食品系统无关。1993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清楚地可以看到这个转变：“食品实际上就是商品。”随着福利国家缩小，国家的福利都转嫁给地方政府，社会补助则交给了公民社会组织(CSOs)和家庭。食品银行开始出现，填补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留下的空白。食品银行于1967年首次在美国成立，其与社会福利机构不同，不透明，缺少课责性，但其在世界各地普及起来，为“剩余人口”提供“剩余食物”。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为人类消费而生产，使得不能在市场上卖出的产品成为过剩。于是为了解决食物浪费和贫穷的问题，就是剩余食物的再分配。然而，这美好的想象通常忽略了政府削减社会补助的影响，以及农业食品公司在食物风险提高中扮演的角色。40%的食物被丢弃掉相当浪费，减少浪费可以让我们养活很多人，但是食物不安全的原因不是由于食物短缺，而是不平等。目前世界上多数的谷物和油籽都被用来制作动物饲料，生物燃料，以及工业产品，如果糖，玉米糖浆，但没有被做成食品。因此，减少食物浪费需要对农业的

利润取得结构和部门补贴的影响进行减至，看如何影响了食物和饥饿的再生产。

### › 进展不顺

1996 年的世界食物大会上，大会承诺到 2015 年会让营养不良人口减少一半。当时估计暴露在食物不安全之下的人为 7.99 亿。2009 年，这个数字达到 1,023 亿。FAO 在 2012 年通过有所回应，透过采用新政策，2015 年营养不良人口减少到 8.15 亿，并不多。此外，非洲和中东由于战争和武装冲突，营养不良人数很多。近几十年来，世界不同地区的武装冲突使数百万人成为食物不安全的人口。根据 FAO 2017 年的统计，世界上 8.115 亿长期食物不安全和营养不良，60% 的人生活来自战乱国家。约 75% 因营养不良而发育迟缓的儿童是来自战乱国度。由于战争破坏国内经济，基础设施，导致数百万人成为难民，而在各自区域内遏制人口流动的企图已使邻国成为难民营。巴基斯坦和伊朗的 600 万阿富汗难民以及土耳其，约旦，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的 560 万叙利亚人只是近期大规模区域人口迁徙的两个例子。虽然难民长期暴露食物不安全和营养不良，但他们也成为东道国食物不安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 › 未来的食安威胁

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将上看 90 亿。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浪费消费模式和全世界的战争带来了难民，食物不安全程度可能会糟。目前为止，我们寻找提高生产能力和改善弱势群体获取食物的方法，试图通过工业化耕作方法提高生产能力，导致更有效率的生产食物，并使数百万农民和小农户迁入城市。化学肥料也造成了重大的环境问题，例如土壤退化，空气和水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约有 13% 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于此。气候变化影响的增加对全球的生产能力构成了另一个威胁。在寻求新政策以改善食品的可获得性和可获取性以

及减少损失和浪费的同时，我们可能还需要挑战质疑我们现有的饮食，消费习惯结构，以及上个世纪普遍存在的农业食品系统的组织。

新兴的食物自主权运动组织了农民，工人，消费者，努力建立替代食物体系。虽然食物自主权与的以前的食安论述有一重迭，但是其强调各州在确定国家 / 地方边界内的食物供应条件方面的作用，包括对全球化的抵抗。其和新自由主义对食安论述不同，食物自主性的论述框架认为食物是人权，强调当地人民拥有和控制土地，水，资源的重要性，也强调可持续性和弹性，而不只重视效率，并请拒绝使用食物作为武器。与食安一样，食物自主性论述是动态的，流动的，由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历史所塑造。观察食物自主性在重建公众对食物系统优先事项的看法和重新定义食安方面的作用，将会是有趣的研究。

來信寄給 Mustafa Koç  
<[mkoc@ryerson.ca](mailto:mkoc@ryerson.ca)>

# > 全球现代性

Sujata Patel, 印度高等研究院, 印度, ISA社会学历史 (RC08), 都市和区域发展(RC21), 概念社会学(RC35), 历史社会学(RC56) 研究委员会委员, RC08执行委

**自**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现代性”被使用于讨论全球化理论的本质和内涵,时常出现在文献中。这个概念有两个意含,第一是全球化,第二是现代性,两者在各自相互连接时也重构了理论本身。

全球现代性理论其实一开始出现在主流社会学文献中,其探讨了经典理论在评价全球北方当代变化中的重要性。这个讨论也牵连到了后来的学术讨论,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发展出来的现代化理论是奠基在经典社会学架构和欧洲经验之上的,而这是否可以持续用来解释世界上各地的现代性,是需要被讨论的。后来大家意识到所谓的现代化模式相当同质化,有欧洲中心的成份,世界必须要以欧洲经验为典范,欧洲于是具有主导权。这些学术性讨论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新的观点,取代欧洲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同构型假设并且承认现代性在全球上的异质性。

主流社会学对这个立场的接受有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因为其允许从不同系谱的观点去对现代性进行讨论,像是韦伯,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然后将这些与其他在全球北方以外所发展出的理论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检视,也就是称为本土理论或南方理论。这种新观点的出现让讨论的视野扩大了许多并且形成了一个独立研究和反思的领域。目前,全球现代性的学术文献聚焦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议题,并且拓展了社会学的基础。持续的辩论仍发生之中。在这篇短文里,我将阐述自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

代初以来出现的三种现代性理论:本土理论,南方理论,以及解殖民理论。

## > 多重现代性

多重现代性理论有多种变形。此概念由 Shmuel Eisenstadt 发展出来,他是这个理论的始作俑者,将现代性与文明研究阐连,可是,这种观点也关于了试图让现代性和文明脱勾的理论家,其有下列假设:a) 现代性不是单数,而是复数。b) 虽然现代性的再现或许相似,但是其差异是奠基在文化脉络上的。c) 为了理解其中差异,我们必须重构社会学的新典范。

所以多重现代性的讨论一开始是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是在讨论欧洲不同的现代性经验的背后的组织方式,做出历史和哲学的提问,并关心这些差异是否能透过一个架构去理论化。再者,学者们也试着将现代性核心的理论成份与其边缘成份相对立起来。Eisenstadt 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类的能动性,能动性一种自主,理性,创造,和自由的能力。此外,如果能动性是关键,那么这个关键在世界上的再现会如何不同呢? Eisenstadt 论证认为这个核心,也就是人类的理性能力,起源于轴心世纪的文明。而在基督教欧洲轴心文明中,现代性第一个出现,然后传播开来。这种西方模式一开始并不被接受,并且其文化属性被选择,重新诠释,和重新建构,成为其他轴心世纪文明的特质。后来核心的特征浮现,成为了现代性的后来核心。因此,尽管某些制度上如职业,教育,城市发展,全世界总会有同构型,但是异质性

>>

“我们必须去重构现代性理论，因为主流的西方论述把主体经验科学化成为客观的普世法则。”

不可避免，因能动和结构相互形塑。

也有人认为多元现代性理论促成了当代社会理论的文化转向。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现代性的讨论中，现代性有任何代表性。此外，虽然本论文主张历史性，但没有提及殖民主义，其现代性的组织，其剥削过程，以及它与知识体系的关系，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关系。下面讨论的观点解决了这些问题。

### › 本土理论和南方理论

本土理论首先假设社会科学在地方上设定研究议程的能力方面必须要有自主性。Raewyn Connell 认为北方和南方的不平等权力分配导致了北方理论的普遍性预设。在南方的理论研究中，有两个概念描述了这个现象。第一是由 Paulin Hountondji 提出的“外向性”，他将其指涉社会科学的外向性。第二是 Syed Farid Alatas 所提出的“学术依赖”。后者认为西方知识是霸权，所以是去脉络化的。于是学者们认为有必要从“本土”叙事和文化中构建替代版本社会学。

本土理论认为，若社会科学通过与其哲学发展出西方社会科学，那么应该也可以和非西方的哲学文化互动产生非西方的社会科学。其希望产生自主性，抗衡西方主流认知模式。并且聚焦在本土历史和社会的脉络，在西方或北方社会的“普遍法则”论述典范之外制定社会学的“替代”版本。

由此而言，我们发现有三种立场。第一个是由奈及利亚社会学家 Akiwowo Akin-sola 所论述的，其肯定社会学可以从其人民的叙事，神话和谚语以及“真正非洲智慧的规律性”中去形塑而成。这派学者汇集了从奈及利亚 Yoruba 部落的诗歌中萃取社会学理论，认为这种诗歌中的原则载明了社会生活的单位是个体，而个体因为“物质需求而与其他个体交往”，基于共同利益的社群生活对个体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个观点由于其所代表的各种方法论

和认识论问题而受到质疑，例如用庶民文化去构建社会学理论知识，其翻译和诠释的“真实性”，以及是否可以通过科学的检验等等。

本土研究的第二个立场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新的知识体系是否可以通过科学方法的检视，于是认为西方科学不是唯一的科学体系。Syed Farid Alatas 论证了一个既相关又重要的自主社会科学系谱，透过质问是否可以使用不同的文化及其认识论来重构新的批判性科学去解决本土理论的问题。其认为，本土知识体系，例如伊斯兰教的知识体系，在其中具有可批判性。其认为这些原则也可以于重构社会学方法。问题是，伊斯兰教如何在不承诺伊斯兰社会学或伊斯兰物理学的前提下为新的知识体系提供形上学和认识论的基础？这种质问并不意味着放弃科学，特别是批判性，而是扩大范围，融入来自非西方文化的批判性理论系谱。

本土理论的第三种取径来自 Linda Tuhiwai Smith 的研究，其认为西方科学是考察的重点，认为有必要取代其西方科学实践，因为这些使得主体成为研究对象。西方科学通过不涉及内部知识论的讨论，将“普世法则”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和地区。其建议要重新研拟科学的方法论，论证去建立一种对个人，社群，和文化价值有细致认识的科学。她要求研究人员思考如何处理所谓客观主义研究，并将从属/本土的声音纳入研究。

这三个立场的根本是南方的学术实践的问题。以马克思的观点来说，社会科学需要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对世界进行解释。所以从而出现了一种更具革命性的立场。

### › 解殖民主义观点

解殖民主义理论，又称为解殖民主义现代性研究纲领，是源自于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运动。其借用了多重领域的理论，包括依赖理论，解放神学，拉美社会运动理

论。其范围很广，认为有必要对欧洲现代性理论进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批判，进而建构新的知识体系。它主张透过新的认识论去重构社会科学，这些假设可以将现代性的探究延伸到“思想国界”以外。

其一开始认为，现代性理论和社会学中的主要断裂是理论语言中对于解殖民经验的忽视与删除。这导致了现代性理论以族群为中心，也导致了欧洲中心主义。对去殖民主义者来说，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镶嵌在所社会科学中的知识体系，特别在历史和社会学中。有三个立论可以解释这个观点：Anibal Quijano 理论化的“权力殖民”；Enrique Dussel 概念化的“内在性/外在性”；和 Walter Mignolo 构想的“殖民差异”，三者有所重迭。

Quijano 的认为，权力的殖民性建立在两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迷思上：演化论和二元论。首先，演化论将历史理解为线性的发展。这种线性使观在欧洲现代性的理论早期发展阶段概念化，并且在被用于解释非欧洲世界的历史经验时被强化了。再来，二元论是欧洲中心主义用来区分欧洲历史与社会与非欧洲历史与社会的理论工具。透过二元论，欧洲中心主义将非欧洲的知识视为他者，使得欧洲历史与社会成为比较优越的经验（因为它创造了现代性），而其他则是劣等的。

持有权力殖民性的学者认为，欧洲中心主义预设并证成了以下的权力控制机制：a) 经济上透过土地取得，劳动剥削，自然资源控制， b) 军队，警察和政治制度的权力布署， c) 通过家庭和教育体系的性别和性行为，以及 d) 透过阐述认识论/知识体系的主观性形成霸权。

Walter Mignolo 关于被殖民经验差异的说法（现代性与殖民地的区分，还有进一步在知识建构上的分野）延续了“权力的殖民性”的观点，并将其视为是欧洲人的特权知识和政治空间的认知工具。Mignolo 认为这样一来可以理解被殖民经验和被殖民者的想象与知识的从属性。

Enrique Dussel 重杠了 Quijano 的演

化论迷思，认为当代历史论述被设计为从欧洲地区历史向外延伸身，这是一种本质化的内在性理论，让人以为欧洲历史有普遍性。他认为当代的研究需要的是一种现代性的外在性理论，从一种解殖民的立场来观看非欧洲的世界。我们需要重构社会科学里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认识论假设，代换成去殖民的视角。这是相当有野心的研究议程，其企图购购 18 世纪后期形成的当代社会科学知识基础，并重新定义研究主题，专业性，和问题，翻转正个代当社会科学的基础。■

來信寄給 Sujata Patel  
<[patel.sujata09@gmail.com](mailto:patel.sujata09@gmail.com)>

# > 我们(何时)重要吗?

## 回顾波兰社会学

Marta Bucholc, University of Bonn, 德國,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兰



Leon Petrażycki 和 Florian Znaniecki, 两位波兰社会学家

**波**兰社会学的历史自始便是国际与在地之间的紧张所形塑出来的。这个紧张很少有协商的空间，因为它牵涉其深层的学科认同，然后转化为研究的，理论的，制度的，和生命传记的策略。持续的紧张局势部分导因于波兰的社会学基本上是舶来品。尽管在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的前波兰领土上有许多社会思想（这个国家在这个时期并不存在），但它通常是私人研究兴趣。当

社会学制度化后，该学科很快地沿着几条不同的路线发展。其传散过程和 国家学术的传统相互影响。我们很难去讲 Leon Petrażycki 或 Ludwik Gumpłowicz 等作者的贡献。其高度原创性与当地文化和政治利益相互作用，反映了对跨国学术的影响。此外，中欧和东欧学者对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不成比例地大，这由于 1918 年以前进入欧洲帝国科学网络的阻碍是相对低的。

地方和跨国科学网络中的双重经验反应在早期波兰在西方受过教育的社会学家，像是 Florian Znaniecki 和 Stefan Czarnowski，他们的研究必须放在波兰民族国家重建的脉络下来看。那时西方社会是普世的，成为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思考模式，新的职业，新的知识分子风潮，新的政策制定工具。对于新学科的渴望保持了沟通的管道。十九世纪的波兰文化可说是全球的在地故事，而成为社

>>

会学家是实现此目标的方式。

波兰社会学家于是能够宣称其研究成果的普遍性，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因为具有“Solidarność”印记的波兰有重要地位，所以这在理论上也是很有影响力。只是新鲜度很快不保鲜，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社会学有了新生命：1989年之后，每个人都对后共产社会感兴趣，虽然波兰只后社会主一国加的一个？。

某种意义上而言呢，波兰社会学要感谢最近的民主倒退浪潮，这让社会学重拾了这方面的研究兴趣。国外当我们被问到1989年之后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透过回答这个基本上的地方问题，我们的研究可以位民主法治，文化战争，民粹主义反革命的普遍性议题有所贡献，地方经验可以也是有普遍意含的。

但若假设可以反民主潮流可以受到控制然后秩序恢复让波兰社会重新进入2007年之后达到的平稳阶段，那我们怎么行动？目前为止，波兰社会学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自

认为非正常社会的一门学科，研究者在现实和想象上都不太正常。社会学家以波兰的例外主义当成是常态，希望例外状态会变成正常状态。可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

挑战并不是没有用的。19世纪知识分子面段的道德两难是压力的根源，现在也意外得到了新自由主义科学和高教管理主义的支持。保守政府顺利和新自由主义接轨。我在“Sociology in Poland: To Be Continued?” (2016) 一书中认为，调解国际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是波兰社会学的唯一出路。对于诱惑的抵抗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社会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因为对其他人来说很特殊而才对我们自己很重要。■

來信寄給 Marta Bucholc  
<[mbucholc@uni-bonn.de](mailto:mbucholc@uni-bonn.de)>

# > 波兰和德国的青年不 稳定劳工

Jan Czarzasty, and Juliusz Gardawski, Warsaw School of Economics, 波兰, Adam Mrozowicki, University of Wrocław, 波兰, ISA劳工运动委员会(RC44)委员, Vera Trappmann, Leeds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英国



大量资料说明了欧洲年轻世代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因为临时和非自愿兼职工作的增加，工会密度下降，毕业找工作的过渡性困境。PREWORK 研究计划主要研究欧洲国家，德国和波兰。德国是市场调整经济的代表(CME)，保障工人权益。可是200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也增加了临时契约工，

劳动力市场的二极化，工资停滞，工会的特别谈判。波兰则是更接近利伯维尔场经济(LME)，目的去实现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与相应的修法。

两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劳动力市场都处于不利地位，临时就业的增加（在波兰），贫穷和低薪工作的风险增加（德国），两国的经济风险都很大。青年不稳定

性可以从不确定的就业看出来，生活工资的损失，社会的嵌入性，完整的社会权利。失去认同和社会融合构成了不平衡的主观认知。可是虽然如此，但是青年人对抗不稳定的集体动员仍然有限，他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仍然很高。问题是，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作条件，社会意识和年轻人的生活策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波兰和德

国的年轻工人怎么看这问题？他们是否解读成是规范，是个人需要适应的工作环境的部分？

PREWORK 计划聚焦在两个层次：(1) 调查波兰和德国的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不稳定工人的社会经济意识，（每个国家 N = 1,000，随机抽样的年龄 18-30 岁）。(2) 调查波兰（60 人）和德国年轻不稳定工人的 120 多次传记叙述访谈，了解不稳定就业和青年人生活策略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还有其集体动员（和去动员）的形式，年龄介于 18-35 岁之间，必须从事非正规工作，失业，或不稳定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训练）。

我们提供一些初步的观察结果。量化研究揭示了对不稳定的主观看法：48.8% 的波兰年轻工人波和 31% 的的国年轻工人觉得在不稳定的环境下工作，低工资或是临时契约。然而，两国青年的经济态度并不相同。

与我们的假设相反的是，波兰人和德国年轻工人的不稳定地位他们对经济的规范性看法没有太大影响。我们假设拥有临时契约的工人会支持国家强力干预经济和支持平等主义，这在我们研究中利用 15 个变量去测量德国。波兰只有五个变量，结果显示永久合约和临时契约工的差异有统计显著。另外，临时契约工子拥有长期契约的人更放宽对经济的看法。在德国，差异更明显。临时契约的工人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则的支持率稍低（33.8% 对 24.8%），但这些人倾向于社会平等主义（分别为 69.1% 和 65%）。

年轻波兰人的经济立场是支持“国内资本主义”（对波兰公司和国家经济规则的放行）：53.4% 的波兰受访者更喜欢自愿而不是强制性的养老金。只有 12.3% 的德国人赞成。年轻德国人的经济意识更接近市场调整经济（CME），支持共同决策，税收政策对收入差异的补偿，欧洲工人的自由移动（德国受访者的支持率为 88.7%），相比波兰的 66.6%，是蛮大的。年轻波兰人的观点更接近利伯维尔场经济（LME）。

质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与工作相关经验的生命经验。我们建构了六种不同类型的与工作相关的生活策略，这些策略与应对不平等的形式。“劳动者”渴望稳定和可预测就业的预定蓝领工人，要提醒的是，职业弹性不是制度的接受，而是通过其他非工作相关领域的稳订来调整和应对。“专业人士”是渴望获得更高收入和美好前途的稳定全职工作的白领阶级，将不平等合法化。“创意人”有不同的方法让他们在非政府组织，创意职业和文化部门开展，他们认为弹性是免于必要的。最后，“被阻挡”的类型是不确性，是由于心理问题或拒绝保险。而“被取消”类型的特征是从未获得正常工作的类型。

量化和质化结果显示两国的年轻人都感到很不稳定，但不会批评或质疑不平等的分配。大多数年轻人似乎已经习惯不平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生命阶段由于他们正在进行的投资，最终会得到回报，所以认为不稳定是暂时的。这也让工会动

员率下降。易言之，不平等正在“正常化”，年轻人事务为没什么。■

注 1：本文是 PREWORK 计划“波兰和德国的年轻不稳定的工人：关于工作和生活条件，社会意识和公民参与的比较社会学研究”的部份，由波兰的国家科学中心和德国研究中心（DFG）支持。德国的研究团队包括 Vera Trappmann, Jule-Marie Lorenzen, Alexandra Seehaus, Denis Neumann。波兰团队包括 Juliusz Gardawski, Adam Mrozowicki, Jan Czarzasty, Magdalena Andrejczuk, Aleksandra Drabina-Rózewicz, Jacek Burski, Mateusz Karolak, Agata Krawowska。

來信寄給

Adam Mrozowicki  
<[adam.mrozowicki@uwr.edu.pl](mailto:adam.mrozowicki@uwr.edu.pl)>

Jan Czarzasty  
<[jczarz@sgh.waw.pl](mailto:jczarz@sgh.waw.pl)>

Juliusz Gardawski  
<[jgarda@sgh.waw.pl](mailto:jgarda@sgh.waw.pl)>

Vera Trappmann  
<[V.Trappmann@leeds.ac.uk](mailto:V.Trappmann@leeds.ac.uk)>

# > 为什么人民投给右派？

Katarzyna Dębska,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Kamil Trepka,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兰

PiS有广大支持，但也有很多人反对。Flickr/  
Platforma Obywatelska RP。

**A**rlie Hochschild 在 2016 年的《[全球對話](#)》解釋說社會學家若要去回答本文的标题问题，那么必须从镶嵌在经济重分配的情绪和传记中去找答案。我们的团队从類似的直覺中进行了研究（作者 Maciej Gdula 教授作是主研究員，加上 Stanisław Chankowski, Maja Głowacka, Zofia Sikorska, Mikołaj Syska），我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 PiS 自 2015 年起为什么能够成为波兰執政党？PiS 一般说来被认为是社會保守黨：在價值觀方面保守，经济方面希望国家管控。雖然 PiS 在歐洲懷疑論者和民族主義者的立场上受到来自歐盟和波蘭社的批評，不过其支持度一直在稳定成长，2017 年底其支持度破半了（50%）。

## > 研究简介

我們的研究是在波蘭中部的一個縣進行：“Miastko”（波蘭語中的“小鎮”）。執政黨在 2015 年在 Miastko 得到 50% 的選票，全國得票率 37.6%。这让我们写了这份研究报告：



“從小鎮的窺探波蘭政治中的新威權主義。”自 2015 年 PiS 都使用了“变得更好”的竞选主轴。

為了研究 PiS 支持者的政治态度，我們访问了 30 名 Miastko 的居民，共两波访问：第一波是聚焦在生命傳記，第二波是关于他們對墮胎或福利國家政策等問題的意見。我們采用了 Bourdieu 的的階級差异理論以及 Maciej Gdula 和 Przemysław Sadura 的波蘭經驗响应。受訪者被分為兩群，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沒有访问“轉型下的魯蛇”，這意味着 1989 年以後在资本主义转型下的无法获利的人。

## > 爭議話題：墮胎和難民

工人階級的受訪者多數反對完全禁止墮胎，年紀大的女性工人階級則贊成現行反墮胎法的放寬。女性中產階級通常贊成墮胎的重

要，強調養育小孩的負擔昂貴。雖然我有些受訪者對反墮胎規定自由放寬方向是支持的，但是反對墮胎的聲音也很多。

大多數受訪者是反對波蘭去接收難民的。工人階級認為，難民不工作，只想獲得社會福利，強調了這樣對波蘭社會福利制度的危害，以及分配上的不公。受訪者會把難民連結上戰爭受難者，承認應該幫助他們，但是不是在波蘭幫助。樣本之中只有兩人認為接受難民進入波蘭社會不會影響到任何人，因為其實人數相當少。

有更多的中產階級受訪者認為難民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他們不願意融入波蘭和歐洲文化。很少人認為難民與波蘭的戰爭和政治動蕩有歷史上的共通性。中產階級受訪者也說難民應該留在“他們自己的地方，那里有自己的社會歸屬。”有人認為歐洲的是排他的，因此保護歐洲的“純粹”必須要求

>>

特定的宗教背景和国家的人禁止进入。有一位中產階級女性受訪者说，若難民需求波兰，那要和波蘭社會有所隔离。

### › 民主法治的破壞

波兰政府在2015年12月開始阻碍憲法法庭。憲法法庭的任務是去判斷法律是否符合波蘭憲法。立法選舉前一個月，前政府於2015年9月的大选指派了五名法官到憲法法庭。議會多數派当时是保守自由派的Civic Platform和農民黨的聯盟，其有權选出三名法官，但后来五名当选。虽然法庭維持了三名（合法選舉產生的）法官的選舉还有宣判让两名（非法當選的）法官当选無效，但是PiS主導的議會提名了五名新法官，並终止法庭判決。總統 Andrzej Duda 宣誓就職的新任法官不僅導致了憲法危機，而且还導致了華沙和波蘭其他主要城市的街頭示威活動。这样的宪法问题不是阶级的，而是黨派分裂的，PiS支持者是支持的，认为“多元化”回到了法庭。反對者则认为這些措施是對民主的伤害，成功地造就了威权政府。

### › PiS 社會政策：“家庭500+”計畫

“家庭500+”計畫於2016年4月开始，这是PiS政府社會政策的主力。该计划是关于儿童福利，每個家庭有第二個和第三個孩子的话，可获得500波蘭茲羅提（約120歐元）（貧困家庭的第一胎也有補助）。这是後共產主義波蘭的重要

政策：自1989年以來波蘭政府首次實施大規模的重分配，让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受惠。

多數选民支持家庭兒童福利政策，唯一的例外是自由派中產階級认为是“政策买票”。多數中產階級是贊成的，认为是國家实力的表现。兒童福利並不奢侈，是典型的西方國家的“正常”政策，也是波蘭属于欧盟的表现。工人阶级也贊成兒童福利政策，多数表示地方政府要负责。

### › 支持PiS的多重原因

PiS透过通過重分配計劃来经营其政治版图。我們的研究發現PiS的支持者遠比大家所所想的的更為分化。本文試圖探討這些社會差異，以及我們如和解是右派政黨的高民意支持度

我們的研究也发现，不单单是因为对于窮人的财政补助而让其支持PiS，还有PiS回应召唤了各类的需求和價值。PiS的政治人物批評“精英”，为的是去讨好工人階級。这也关于中產階級對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的掌控。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发现：政治立场並不總是與受訪者的個人經歷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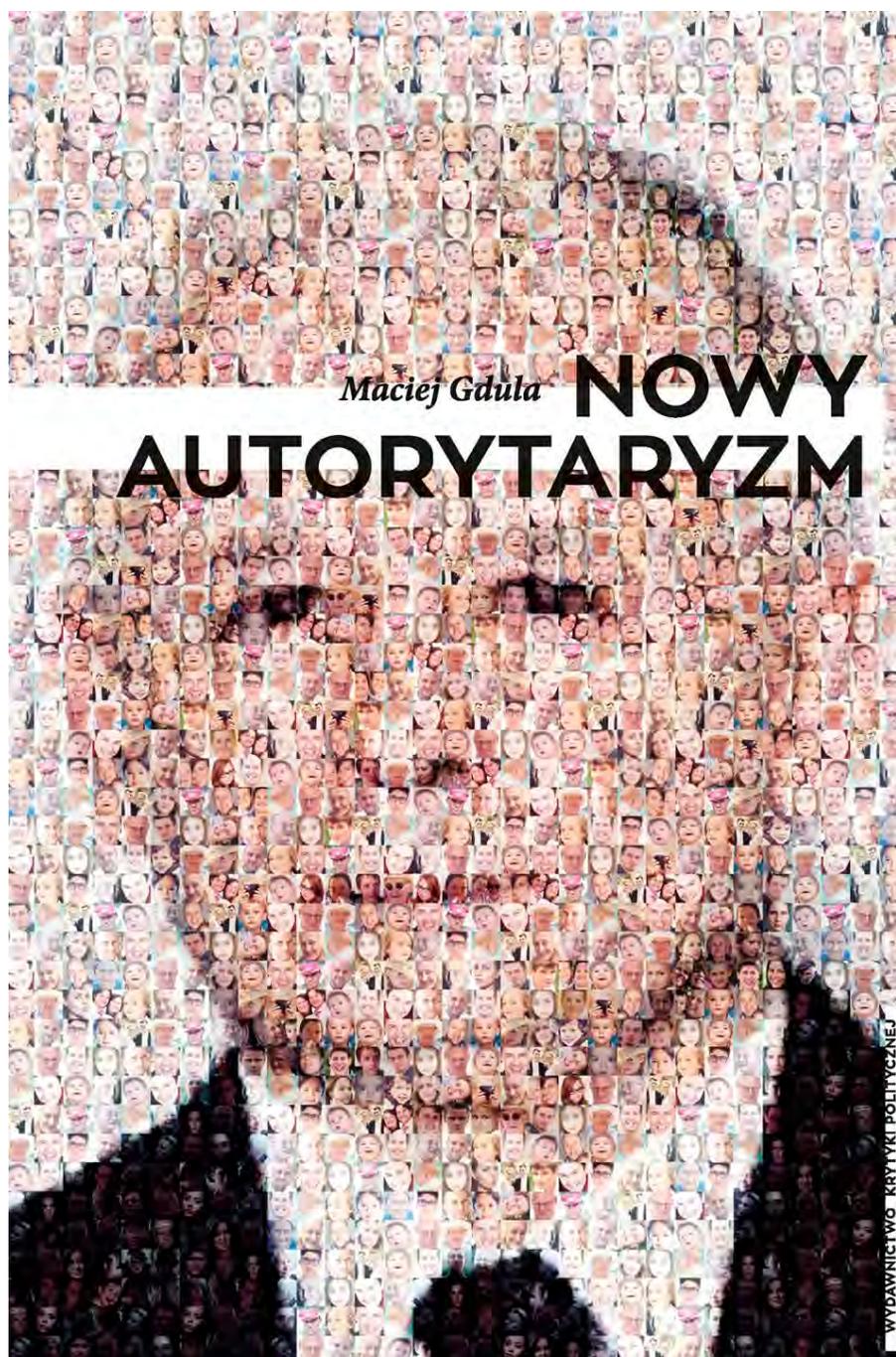
同時，PiS用“民主”和“變得更好”的诉求戕害民主（像是憲法法庭）。我们发现PiS的支持者認為自己是“民主的”，但排斥自由主義的形式，认为是自我限制。Maciej Gdula用“新威權主義”概念解释这种现象。根據Gdula，現在有一種新興现象，就是“新威權主義”改變了公共領域（因特网类型的）之中選民与政黨的关系。

研究結果證實我们对右派政党的民意支持的解释已经不够用了。我们的研究激起了公眾的注意，引發了廣泛的公共辯論，左派和右派都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討論波蘭社會的分裂。■

來信寄給 Katarzyna Dębska  
<k.debska@is.uw.edu.pl>  
Sara Herczyńska  
<sara.herczynska@gmail.com>  
Justyna Kościńska  
<j.koscińska@is.uw.edu.pl>  
Kamil Trepka  
<k.trepka@is.uw.edu.pl>

# > 新公共领域社 会学的前

Maciej Gdula, University of Warsaw, 波兰



Gdula的新威權主義是公共社會學得一個好例子。

2017年11月，选举结束两年后，PiS（法律与司法党）组成政府。虽然过程之中违反了许多自由民主的游戏规则，可是还是获得了大于40%的选民支持。对此，我撰写了报告“Miastko的蜕变：从小镇的窥探波兰新威权主义”。

该报告以波兰中部的一个小城市Miastko为对象进行的研究，并且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辩论之中的社会与政治的议题一直发酵，有些概念已经成为讨论的惯例。这其实没有什么，但我想讲的是可能性的社会条件，因这对于重新思考社会学在公共领域的存在，以及对于社会过程的影响非常重要。虽然这些发生在波兰，但这不是波兰的特例。



是科学复杂性的再现。简化和普及的目的是产生社会关注，引入复杂性以可以激起公共的辩论与讨论。

### › 社会学的角色

社会学可以让我们从中获得什么，然后生产出有共鸣的知识呢？这很难，但我会试着去回答这个问题。

这种类型的社会学有机会在一种暴力和化约为至上原则的沟通文化中去平衡冲突。我们不该指责记者和政治家沦入这个地步，因为其有特定的结构限制和机会。然而，我不认为社会学不能去介入改变，好去让公共领域的沟通更有效。

社會學的一个重要课

题是为公共领域中无法发言的人发言。對我而言，為大眾普羅階級創造一個空間並呈現其生命經驗是很重要的。

第三個問題是社會學如何在公共領域與其他參與者之間定位。我認為，一個立場是與記者和政治人物的對立一樣。社會學的反思性產生的知識不同於其他類型，其自主性來自於對於社會壓力和政治衝突保持一定的批判距離。此種社會學可以透過限制定義社會現實的權力去平衡公共領域中的權力分配。■

來信寄給 Maciej Gdula  
<[gdulam@is.uw.edu.pl](mailto:gdulam@is.uw.edu.pl)>